

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论坛

通 讯

第 3 期 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委员会

2012 年 3 月 15 日

目 录

- 一、《社会建设论》前言·····陆学艺（1）
- 二、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及日寇的“五一”大扫荡·····刘锡庚（6）
- 三、“三化”统筹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万宝瑞（13）
- 四、应对气候变化 科学发展森林·····贺庆棠（17）
- 五、拍摄“北大荒”电视纪录片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郭书田（20）
- 六、民族文化与自主创新·····孙万鹏（25）
- 七、增加水利建设投入的意见·····雷锡禄（30）
- 八、25 年农机化发展战略的历史渊源·····张蓝水（33）
- 九、开发生物质能 走绿色能源之路·····吴信达（50）
- 十、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确权的两个问题·····卢 文（52）

《社会建设论》前言

陆学艺

编者按

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教授为已出版的《社会建设论》写的前言，这是他主持的《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在近年来出版的第四部有关中国社会问题的专著，这部著作中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提出质疑，主张“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值得高度重视。

进入新世纪以后，我国的经济持续高速发展，几乎超过了所有人的预料。与此同时，中国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凸显，这也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料，特别是当经济发展受到国际国内因素冲击而出现波折时，经济矛盾、社会冲突纠缠在一起，于是各种“盛世危言”就出来了，使人忧心忡忡，手足无措（近几年，有一批投资移民涌向国外，这些人多数是改革开放的既得利益者，这在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外逃，是很少有先例的）。如何正确认识当代中国新时期出现的这种十分矛盾的社会现象，弄清、弄准产生这种矛盾现象的根源，在全社会取得共识，采取相应的对策，逐步解决这些矛盾，使社会更加和谐，这是当今中国政界和学界面临的一项很重要的新的历史任务。

我有位阅历很丰富的老朋友，两人对话时，问了我两个问题。一是改革开放初期，经济社会问题堆积如山，矛盾重重，那时研究得出一个结论，认为主要是因为穷，把经济搞上去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解决了。现在经济建设得比原来设想的还要好，但是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反而多了，复杂了，这是为什么？二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党和政府，做成了这么多大事，这么多好事，为什么老百姓对我们还有这么多意见？他提出的这两个问题，实际也就是要回答现在为什么会出现“经济报喜，社会报忧”以及如何解决好问题，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有位经济学家讲，中国的经济搞得这么好，一定是中国做对了什么。套用他的逻辑，我想中国在经济发展得这么好的背景下，出现这么多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而且越演越烈，屡解不决，那一定是我们做错了什么？或者说我们还有哪些重要的应该做的工作还没有做。

我这些年来，调查研究，读书思考，主持课题，编书写作，就是想较好地回答那位朋友提出的这两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想弄清楚在经济发展得这么好的背景下，我们还有哪些很重要的应该做的事没有做，或者说，我们做错了什么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摒弃了阶级斗争为纲的路线，确定并执行了坚持经济

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进行经济体制改革，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涌现了一大批经济学家，为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发展出谋划策，做出了很大贡献。多年以来，大家已经习惯运用经济理论和方法观察和分析问题，习惯用经济政策和手段来解决矛盾和问题，这在一定的阶段是完全必要的，实践证明也是正确的。但是当经济建设发展到了新的阶段，在解决了短缺经济问题，特别是进入了工业社会的中期阶段以后，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除了人民群众对物质生活又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之外，还迫切要求满足精神文化方面的需要，这光靠经济发展就不能适应这种日益增长的需要，光靠经济理论和方法来考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也就不够了。

国际上，现代化国家发展的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家要实现现代化，最基本的是两条：一是经济要繁荣发达，二是社会要全面进步，两者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缺一不可，所以经济社会一定要协调发展。当今中国的问题是曾经有一个阶段、一些部门、一些地方过分强调经济建设的重要，搞起了 GDP 挂帅，忽视了社会建设，造成了“经济这条腿长，社会这条腿短”的尴尬局面，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成为当今中国最重要的矛盾，已经出现的许许多多经济问题、社会矛盾，正是由此派生出来的。要实现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不仅仍然需要经济理论和方法做指导，而且还需要运用社会理论和方法，也作为观察分析问题的指导思想，改革社会体制，调整社会结构，制定相应的社会政策和措施，化解社会矛盾，解决社会问题，逐步使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1998 年秋，中国社科院的领导给社会学研究所交待了一个任务，要社会学所开展关于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调查研究。我当时担任这个所的所长，受命以后，领导班子几经协商，认为这是摸清摸准基本国情的在经济结构以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一个重大课题，而且社会结构研究历来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问题，所以这也是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重大课题。对院里布置的这个任务，大家都很积极，乐意承担，所以很快取得共识，并决定调集全所十多位业务骨干，组成《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由我担任组长。课题在社科院正式立项，为院的重点课题，得到了重点资助和支持。课题组成立以后，经过调查研究和集体创作，于 2002 年 1 月出版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历时三年多。2004 年 7 月出版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历时两年半。2010 年 1 月出版了《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前后历时五年半，比前两本著作的总和还要多，为什么？我在该书出版的后记中讲了三原因，“一是社会结构理论研究的难度较大，我们几乎是从探索社会结构的定义开始的；二是正逢当代中国社会变迁，新现象、新事物不断涌现，日新月异，而我们就是要通过社会结构理论来分析这些复杂

的形势，并据此提出化解社会矛盾和问题的策略；三是课题组增加了多位新成员，新老衔接用了一些时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建设蓬勃发展，经济空前繁荣，经济结构等经济学名词概念普及到社会各个阶层，很多人耳熟能详。但是，像社会结构这样一些重要的社会学概念，至今人们还相当普遍地感到陌生。鉴于此，本课题组认为，在目前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阶段的背景下，提出通过社会结构理论，作为观察新阶段、新形势的新视角，很有必要，很有意义……旨在通过这项分析研究来剖析当代中国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解释中国社会快速变迁的深层原因，提出改革社会体制、创新社会政策、调整社会结构、促进和谐社会建设的战略和策略，以期使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大业发展得更好。”

这段话，主要是解释《当代中国社会结构》这本书研究写作时间长的原因，同时也是阐明课题组写社会结构这本书的宗旨。其实，从我自己来说，还想通过这本书回答我那位老朋友向我提出的那两个问题，解释清楚中国进入新时期以来经济报喜、社会报忧的原因，提出我们应该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建议，去做好那些应该做而还没有做的工作。国内国外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仅仅实现经济现代化是不够的，还必须要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等等。

如果说，真要检讨我们做错了什么的话，那就是我们抓社会建设抓得晚了。搞现代化建设，经济是基础，经济建设是中心，经济要先行，这肯定是正确的，但是，在上一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建，经济起飞的时候，政府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就是不正确的。这实际上是后来不少部门、地方搞 GDP 挂帅的理论根据。在这个口号的引导下，为了“创造”GDP，提高“效率”不惜牺牲农村、农民利益，不惜牺牲资源环境，不惜牺牲社会建设，有些市县竟然大幅缩减教育、医疗卫生经费，拿去创造经济效率，自此，上学难、看病难的呼声就响起来了。在这个口号的引导下，农民工、工人的工资十几年不涨，而国有企业、国有银行的老总自己做主给自己发几千万元的年薪；城乡、地区、行业、社会成员之间的贫富差距就从此拉开，并且逐年扩大，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的议论就不断见诸报端。中国是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家，是个“不平则鸣”，“不公则不安”的国家。据公安部统计，1992年全国公安系统立案的刑事犯罪案 158.3 万件，2010 年 597 万件；1992 年全国公安机关受理的治安案件 295 万件，2010 年为 1275.8 万件；分别增长 377.1% 和 432.5%。十八年，刑事犯罪案件翻了近两番，治安案件翻了两番多，年均增长 7% 以上，太不和谐不安定了啊！当然，这些年的“社会报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个方针，喊错了，是很重要的一个原因，

这是不争的事实。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口号，一经提出，社会学家、政治学家、还有一部分经济学家和有识之士，就提出异议。有学者指出，这样的口号，连资本主义国家的当政者，都不敢公开提的。我们这样一提，后患无穷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引出的严重后果，引起有关方面的注意。2002年十六大文件把这句话改为“坚持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2007年十七大的文件又改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俗话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改起来也难啊！更何况，这句话对某些地方政府、某些人有巨大的利益。请看，中央多年来已经三令五申禁止乱占耕地、禁止强拆蛮拆农民居民住宅，但至今还是禁止不住，最近，连梁思成的故居都拆平了，暴利所在啊！更何况他们也有“理由”，他们是在“创造GDP”，“创造效率”啊！可见，要改正这个口号，消除近二十年来已经形成的流弊，一要从理论上说清楚，这句话错在哪里，为什么不能提倡；二要提出新的方针。我认为根据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本质特征，针对当前经济报喜，社会报忧的特殊国情，尽可能增加社会和谐因素，尽可能减少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要提出“公平优先，注重效率”是比较合适的。

十六大以来，特别是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十六届六中全会专门就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作了决定，十七大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总体布局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加进了社会建设，成为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并写进了新修改的党章中。2011年春季中央专门举办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讨论加强创新社会管理问题，胡锦涛同志作了重要讲话。近几年来，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已在全国蓬勃开展起来，各地的党和政府都很重视，投入了很大的力量，在社会建设、社会管理方面做了很多开拓性、创造性的工作，创造了不少新的经验，已经涌现了一批先进的典型。社会形势正在发生新的变化，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协调的状况正在扭转，正在向经济社会协调方向发展。

我自主编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在2004年出版以后，仍主持中国社会结构变迁课题组的工作，和课题组成员一起，一直在研究中国社会阶层关系、中国社会结构和中国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等问题。《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出版以后，随即就转入了《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一书的研究和编著，因为在调研社会结构的同时，就对社会建设做了很多调查和研究，所以《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一书进展得比较好，预计今年5~6月间可以付梓。

这五六年间，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先后到江苏、浙江、广东、福建、西藏、

湖北、四川、河北、安徽、上海、北京等省市自治区的城乡调查，受到了当地党政部门工作同志和群众的热情帮助和支持，听取了他们的宝贵意见。特别是在浙江宁波、福建晋江、江苏太仓、北京延庆、四川成都、广东深圳等地做过长期蹲点调查，和当地党和政府合作，共同研究社会结构、社会建设和管理等问题。

合作调研期间，我们和当地的干部、学者一同下乡，一起到街道社区，听取干部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一起开会研讨，许多关于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新做法、新知识、新经验，都是从实践中来的。所以，这些年课题组和我的研究成果，都凝聚着他们的劳动和智慧。在此向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

汇集在本书中的 42 篇文章，是我在上述调查研究社会结构、社会体制、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等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成果。多数是应报刊的要求写的，也有是应党政机关、学校邀请做学术报告的讲稿，还有是我为几本书写的序言，另有几篇是记者和同行学者对我的访谈，因与我本书的论题相关，故也收录进来。鉴于近几年关于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实践已在全国各地展开，需要理论工作者的参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长谢寿光同志知道我一直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多次敦促我把这些成果结集出版，专门委派责任编辑佟根兴同志帮我整理编辑。他很敬业，接手之后，精心加工，很快成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李阿琳同志帮我从百余篇文稿中，通读挑选，分类编排，形成初稿，出了大力。当此书出版之际，谨向他们表示感谢。最后，我还要感谢我们课题组的成员们，十三年来为了研究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等重大问题，我们长期共事，精诚合作，和谐相处，团结协作，集体调查，集体研讨，集体创作。课题组初建时就参加工作的成员，有的现在已经走上新的岗位，行政和学术任务都很繁重，但只要课题组开会，诸如新课题开题、讨论框架、统稿、完稿，他们都能拨冗参加，继续贡献智慧。因为有了这样一个团队，长期努力工作，已经有好几部著作出版，发表了很多文章，课题组成员也都得到了锻炼和成长，其中也包括我自己，也正是在课题组这个集体长期共同调研中，受到了教育，受到了启发，弄清了许多问题。本书有多篇文章就是在集体调研过程中形成了思路而写出来的。我多次讲过，社会学研究，特别是处在当今中国社会大变迁时期的社会学研究，集体调研、集体创作是一种很好的形式。这是我的心得。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北京工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原所长）

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建立及日寇的“五一”大扫荡

我一生最艰难最惊险的一段经历——回忆杂记之四

刘锡庚

编者按：

今年是日本侵华期间在冀中实行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的“五一大扫荡”70周年。1942年是在抗日战争中最艰难、最残酷、最惊险的一年。农业部一位老部长刘锡庚同志已96高龄，是这段反扫荡斗争历史的亲身参与者和见证人，撰写了这篇十分真实而珍贵的感人经历，不仅为研究这段历史有重要价值，而且能够发挥“以史为鉴、勿忘国耻”的爱国主义教育作用，这段历史是不能淡化的。

今年是日本侵华对冀中“五一大扫荡”七十周年，我亲身经历了那场最艰难最残酷最惊险的大扫荡。现将实况记述如下，望后人以史为鉴，勿忘国耻，且记强国必须强军，为振兴中华民族伟大事业而努力奋斗！

一、冀中概况

冀，河北省的简称。冀中是指津浦铁路以西，平汗铁路以东，北宁铁路以南，石德铁路以北这块平原地区。这块地区人口密集，物产丰富，有大宗的粮棉、牛羊毛皮，有杨木森¹在高阳办的纺织工厂；交通发达，商业繁荣，有华北最大的蠡县留史毛皮集散地，有闻名遐迩的祁州中药材市场，当时，县城三十余座，村镇八千多个，面积达六万平方公里，军民六百多万。冀中地区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不少城镇乡村即有共产党组织，并发生过轰轰烈烈的高（阳）蠡（县）暴动。更有“华北明珠”之称的白洋淀。白洋淀是华北平原最大的生态湿地，当年水域面积336平方公里，淀内水陆交错，田园、芦苇、荷塘、村落点缀其中，纵横壕沟将全淀分割成大小143个淀泊，并各有其名，那里水产丰富，鱼虾大蟹、野鸭鸪丁（像鸡的水鸟），芦苇白藕、菱角、鸡头米（像薏米粒的特产），遍布淀塘。人人都会捕鱼抓蟹，户户都会拈苇织席。夏日波光潋滟，苇绿荷红，冬天冰晶千里，漫天芦花。那凿冰捕鱼的冰床，来往交织，更是一幕独特的景观。我自延安来到安新白洋淀上，这里也成了我的第二故乡。自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日本鬼子像蝗虫一样端着机枪、刺刀，铺天盖地扑向中国大地，杀人放火，抢掠奸淫，乱抓无辜，无所不为，从此，敌占区的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敌占区成了人间地狱。

¹杨木森，河北省安新县人，在高阳县开设纺织厂，是一位民族资本企业家

二、冀中紧紧地钳着日寇的臂膀和咽喉

1938年4月，晋察冀边区冀中区行政主任公署建立。黄敬任冀中区党委书记，刘亚球任组织部长，周小舟任宣传部长，徐达本任行署主任。冀中军区（第3纵队兼）司令员吕正操和政委程子华以及八路军主力部队120师师长贺龙和政委关项应也率部进入冀中。我于1938年7月7日从延安到达冀中行署，被分配到安新县工作。同那些革命先辈和精英一起带领群众大刀阔斧地开辟革命抗日根据地，通过广泛发动群众，扒铁路、挖壕沟、拔据点、除汉奸。冀中行署逐步建立起36个县级抗日政权。像一把钢钳，紧紧地钳住京津咽喉和四条铁路动脉。在1940秋季的百团大战中，冀中军区的部队在人民群众的配合下，发起任（丘）河（间）大（城）肃（宁）战役，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并大举破坏了平汉、津浦、北宁、石德铁路及华北的一些主要公路。不少铁路和公路被翻了个底朝天。敌人的许多炮楼被拔掉，冒起黑烟。打得日伪军人少不敢出来，夜里不敢出来，伪军没有日本鬼子跟着也不敢出来，而各地的抗日群众组织异常活跃。减租减息运动深入开展，青年参军非常踊跃。“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的场面到处可见。抗日根据地的乡村里，红旗招展，歌声嘹亮，“五月的鲜花开遍了原野……”，“瓜儿不离秧，孩儿不离娘，苦难的中国离不开共产党”不绝于耳。白天军民携手搞大生产，晚上村村是欢乐的海洋。

三、日寇垂死挣扎对冀中进行“大扫荡”

日军在百团大战中遭受致命的打击后，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从华中正面战场抽调2个师团加强华北方面军的力量。经过一年半时间的精心准备和周密部署，1942年5月1日，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亲自坐镇指挥，调集了第41师团主力及第110、第26、第27师团，独立混成第7、9旅团各一部和骑兵第13联队，连同伪军共5万余人，采取“铁壁合围”、“反复合击”“分区清剿”以及“辗转抉剔”等战术，并以派遣特务队、使用快速部队相配合，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规模空前、惨绝人寰的大“扫荡”。企图一举消灭冀中区党政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完全控制冀中地区。这就是抗日战争史上，日寇对冀中军区规模最大最残酷“五一”大扫荡。

5月1日开始，日伪军从石家庄至定县、保定至大城、沧县至德州一线出击，向冀中中心地区合围。日伪军在冀中地区，尤其在河间、肃宁至完县、新乐中心一线，不仅村村挨家挨户搜查，一间房子一个草垛也不放过，而且在田野里几步一个伪军，几丈一个日军，互相呼应，齐头并进。不要说见人就杀，就是猪狗牛羊也难逃厄运，这就是日寇所谓的“拉网式”、“梳蓖式”扫荡，对我根据地的中心地区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县进行“铁臂合围”。企图歼灭我冀中地区的八路军主力部队，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领导机关，实现其“大东亚新秩

序”的梦想。

杀光、烧光、抢光“三光政策”，是日寇对付敌后人民最残酷的手段。在敌人的扫荡中，对抓到的人都要盘根问底，凡语言稍有支吾，就认为你是“八路”探子——杀；手上没有老茧，怀疑你是“八路”——杀。日寇还常常在被围困的人群中，拖出耄耋老人或幼小婴儿，用刺刀捅死，以此恐吓妇孺指点出掩护在群众中的八路军指战员。至同年6月上旬，日伪军占据了冀中抗日根据地所有县城和较大集镇、村庄，共建立1750多个据点，挖掘4000多公里封锁沟，把根据地分割成2670多块。这时的冀中，碉堡如林，公路如织，壕沟如网，画地为牢，敌人为实现其长期占领，在冀中普遍建立起伪政权，并实行保甲连坐法，规定一户“通匪”或“窝匪”，其他各户必须检举报告，否则九户连坐，全部遭殃。日寇妄图把冀中军民困死在他们的魔掌之中。日军惨无人道地到处进行烧杀抢掠，奸淫妇女。在两个多月里，我部队损失1万多人，地方干部牺牲1万多人，无辜群众被杀害2万多人，抓走劳工5万多人，冀中地区出现了村村无人不帶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局面²。这次大扫荡，约两个多月的时间，是1942年75次³扫荡中时间最长，也是最残酷的一次。

四、临危授命，潜回敌占区

1942年5月初，冀中军区遵照八路军总部的指示，除留少数主力部队配合地方武装、民兵在冀中坚持斗争外，主力部队陆续向冀南、太行、北岳根据地转移。主力部队在转移中与日伪扫荡部队经过多次激战。运用“蘑菇战”“麻雀战”战术，牵着敌人的鼻子转，以至迫使敌人回防他的老窝，冀中军区指挥主力部队15个团、地方武装15个支队，共3万余人，在根据地人民的支援及北岳、太行、冀东、冀南等区八路军的配合下，采取以主力一部同地方部队、民兵相结合，在内线坚持斗争，主力大部适时转移至外线寻机歼敌的作战方针，展开反“扫荡”作战。在敌人的“五一”大扫荡中，我所在的冀中领导机关是敌人“铁臂合围”的重点，也最残酷、最艰险。部队刚突出重围，我受命单独重返敌占区，执行任务，险情丛生，可谓九死一生，是一个幸存者。1942年4月，我刚由九地委《团结报》社调冀中行署机关工作，人地都比较生疏。在4月底的那次突围中，回民支队负责掩护冀中区党委宣传部长周小舟转移，我和秘书白秀峰等人随行。4月29日夜里，我们从行署驻地出发，向东北行进，部队抵达武强与敌人遭遇，我们边战边走，折向东南，插入渤海边区的东广、阜城（已不属冀中管辖）。为摆脱敌人的追踪，我回民支队当夜又急行军向北，直

²日伪在冀中大扫荡造成的种种罪恶，见《解放军报》2002年4月29日第7版

³1942年日伪对冀中扫荡75次，资料来自原《冀中导报》副社长兼总编辑朱子强《在病榻上的回忆——三看夕阳》。

奔河间地带。在诗经村找到了河间县游击大队，了解敌情，研究行动。当晚，周小舟部长把我叫去，说：“你带上小白（秀峰）几个人，回冀中根据地去，看看我们的党组织遭到破坏没有？要找到地、县党委，告诉他们坚守岗位，分头领导，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对敌人这场扫荡，要做最坏的打算，争取最小的损失”。我和白秀峰、小刘，还有一名警卫员，离开周部长和回民支队，在河间县游击大队的掩护下，去执行这一艰难的使命。

次日拂晓，我们就被敌人包围。我们突出包围圈，利用冯国璋的坟墓有利地形，将敌人击退，随即向西南方向撤离，到达榆林村已近中午。我们刚从村公所领回粮食准备做饭，另一股敌人又包围上来，我派警卫员前去侦察，他一去未回，生死不明。当我们撤到滹沱河北岸欲渡河时，远远地望见河南岸村庄的房上有人，树下拴着白马，我们估计对岸是敌人，未敢靠近。对岸的人们也发现了我们，招呼我们过去。我们立即退到河滩下，沿着河道向东飞奔，跑了二三里，迎面又遇到一股武装，双方相遇，各自散开，拉开阵势，准备战斗，但对方没有开枪，似乎不像敌人，我们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对方也跟着问：“你们是哪一部分的”？相互都不交底，待了片刻，对方说：我们是之光（原清苑县）游击大队。我问你们的政委是谁？对方回答说：“曹洪涛”。曹洪涛是之光县委书记，我很熟悉，误会解除，双方相聚，问他们为什么离本县几百里，跑到此处，他们说是被敌人拉网扫荡赶到这里，由于人地两生，一直不敢进村，我们将河间和之光两支游击队合在一起，人是多了，可目标却大了，下一步如何行动，我给河间游击队长出主意：“大家化装，把缴获敌人的太阳旗打出来，把缴获日伪军的军服穿上，冒充敌人的扫荡队，从包围圈混出去”。这个办法很灵，我们上了堤岸，大摇大摆地穿过三四个日伪军炮楼，都未受到阻截，下午三四点，我们走进临河镇，刚进村，村维持会的人就提着大锣敲了起来，他们边敲边喊：来部队了，担水、饮马喽！他们见我们进村后原地休息，纪律严明，猜测出是化装的八路军部队，于是“心照不宣”。我们要维持会弄点干粮充饥，他们立即吩咐几个人去办了，坐下不到半小时，维持会的人跑过来在我耳边小声地问：“村南头来了一支部队，你们是一伙的吗”？我说“不是”。同时，我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游击队长。他立即带着部队向西走，与从南面进村的敌人脱离了接触，我走在队伍的最后，出了村口，即见村边的几垛麦秆燃起大火，事后我分析，可能群众看出我们是真八路、假日伪军，点燃了麦垛掩护我们撤退。此时，我们进入交通壕沟，一直隐蔽到晚上八、九点才脱危险。我和河间县游击队从拂晓到晚上，已与敌人4次遭遇，穿越河间、肃宁、献县3个县境，行程120余里，滴水未进，不少战士脚上打起血泡，非常疲惫。这时，河间游击队的队长对我说：“刘同志你都看见了，我们离开河间，人地两生，得不到群众

的掩护，战士已累成这个样子，如你们现在回河间，我们对你的安全负责到底。如继续在我县境外活动，我们很难完成周部长交代的任务，你看怎么办”？说真的，我也没有办法，大家沉闷着，过了一会儿，小刘突然说：“这样吧，先到我家去，我家在刘庄，离南马头不远，离这儿也就20多里，到我们村先找村长，再找乡干部，最后就能找到县委领导”。我们商量后，同意了小刘的意见，于是，我带上小刘和白秀峰，与河间游击队分手，继续前行。

五、艰难使命，天助完成

离开了河间游击队，已经是子夜时辰，小刘领着我和白秀峰向刘庄走去，突然，灯光四射，马嘶犬吠，迎面来了一支扫荡队，我们3人迅速隐蔽，敌人呼啸而过，为防止遇上掉队的散兵游勇，我提议3个人拉开距离前进，这样，如果遇到敌人，可以相互掩护撤退。小刘对地形熟在前面领路，白秀峰在中间联络，我垫后。走了四五里，白秀峰掉头跑回来说：“小刘不见了”。我与白秀峰追了一段，也不见踪影，在静得可怕的深夜里，我们也不敢大声呼唤，我脑海里深深印着：小刘庄离南马头不远。于是找了一个老乡，送我们去南马头，以暗探小刘庄的位置。待我们了解到小刘庄的位置后，就请老乡回去了。这已是下半夜了，在村边一座房子旁，白秀峰踩着我的肩爬进院内，打开院门，我俩走到上房的窗户前，轻轻地叫着：老乡，开门哪，我们是八路军。灯亮了，接着门也开了，出来的竟是小刘和他的父母亲。小刘尴尬地说：你们也到啦，我正担心呢（真是一个奇迹）。进屋后，小刘的父母给我和白秀峰弄了些吃的，然后说：你们住我家里危险，村民发现了不得了，给你俩带些吃的到盐滩上躲着吧，夜深人静了你们再到家来吃饭。就这样，我和白秀峰在盐滩上一个晒盐的池子里住了五六天，人被晒得又黑又瘦，鼻梁晒得暴了皮，撕下鼻梁上的皮，好像京戏中小丑的脸。一天夜里，当我们再回家吃饭时，只见一家人沉着脸，小刘的哥哥说：过两天敌人要在这里修公路，你们不能待下去了，我弟弟年纪小，不参加抗日了，你们走吧。主人下了“逐客令”，找地方党组织的任务要继续，老待下去也不是个办法，我和白秀峰只好离开了小刘的家。

可是，到哪里去呢，手上没有地图，要找的党组织在哪里，冀中离这里有多远，一切都是未知数，我和白秀峰只知道冀中根据地在我们所处位置的北方，于是，我们在夜色的掩护下，以北斗星为坐标，一直向北走，整整走了一夜，天快亮时，我们接近了一个村庄。半片下弦的残月映照着一个熟悉的村落进入我的眼帘，矮墙、大树、箭楼，像一幅版画，眼前的这幅景象，一个月前我和部队曾驻在这个名叫孔庄的村子里，黄昏后我在村边散步时，见过这幅景象。不过，那时的月亮是上弦，像小船一样飘在天边，我对白秀峰说：“小白，这个村可能是孔庄，我像是来过”。小白将信将疑地说：“不会吧，世上哪有那么巧

的事”。我果断地说：“趁天还未亮，进村看看”。进得村后，果真不错，我找到了乡村女教师刘春兰的房子，又是老办法，翻墙、进院、敲窗喊话，我小声叫道：“刘春兰，我是不久前到你校教唱歌的刘锡庚”。连着叫了两三遍，听到有人说：“不错，有这么一个八路军，开门吧”（又是一个奇迹）。刘春兰是个独生女，父母很善良，他们见到我和小白，十分亲切，大妈对大爷说：他爹，你上房子上望着点，我给他们做点饭吃，饭还没熟，大爷从房子上急忙下来说：“敌人进村了，快到放草的屋里躲起来”。我和白秀峰、刘春兰一齐被埋进碎草里，大爷一边埋一边说：“非我的声音，谁喊别答话”。过了一会儿，大爷打开房门说：“出来吧，扫荡队从村边路过没有停”。我们又躲过一劫。当晚黄昏时分，我们辞别了刘春兰一家，决定先找肃宁县委，很快就进了肃宁县境，到达万里镇的一个小村，只见村头有几个老乡在聊天，我上前打听县委领导在哪里，所有的人都装听不懂，我急中生智，从衣服口袋里掏出《冀中导报》社记者小黄捎给他对象的一封信说：“这是上级派我们给县委送的公文，有要紧的事”。老乡看我们不像坏人又很恳切，便让我们把信留下，由他们转交。我说：“不行，这是机密文件，不能托人转交”。坚持了半个时辰，一个老乡离开了一会儿回来说：跟我来吧。进村后，一片断墙残壁，我们钻墙洞，过天桥（房顶之间的梯子），最后进入一间空荡荡的房间，我和白秀峰坐了很久，进来三个人，我仔细一看，正是要找的肃宁县委书记王耐林、县长刘镜心和李伯宁（与其说是巧遇，不如说又是一个奇迹），王耐林同志见了我打趣地说：“老兄，怎么这样狼狈呀”！接着，他们一齐哈哈大笑起来，我也开玩笑地反讥说：“你们倒好，怕我是叛徒来抓你们，吓的钻在洞里不出来”。一阵打闹之后，言归正传，我向肃宁县委传达了周小舟部长的指示，并接着打听九地委的下落。王耐林同志说：“地委领导机关的行动是绝密的，我们获得指示，都是地委的武装交通员传递，你耐心等待吧”。不久，地委的武装交通员贺景环、王敖二人来到肃宁县委执行任务。我要他们带我和白秀峰回地委，贺景环说：“不行啊，没有地委的命令，我无权带任何人到地委去”。于是，我给地委写了一封信，转达了周小舟部长的指示，并问我何时回冀中行署。过了半月，地委指示我暂时在肃宁县委帮助工作，我在肃宁工作了两个多月。9月初的一天，地委的交通员贺景环、王敖二人又到肃宁时，转告我随他们一同回地委。

又是一人黄昏后的夜晚，我和白秀峰跟着地委交通员上路了，我们整整走了一夜，黎明前到了高阳县庞家佐村，贺、王二人叫我和白秀峰自寻住处。恰好庞家佐村是我熟悉的地方，我叫开车妈妈的大门，进去一看战友雪轩正在家中养病，大家久别重逢，十分高兴，当雪轩的侄子建国去村公所领给养时，敌

人进了庞家佐村，建国急忙跑回家中，要我们赶快钻地洞藏身，白秀峰⁴怕不安全一个人跑掉了。这时，周部长派出的4个人，跑了仨，只剩下我一人。

不多一会儿，日本鬼子闯进我们的院子，我们从地洞的瞭望孔里能看到敌人腿和脚，他们翻了一阵，没发现可疑迹象就走了，我们又躲过一劫。夜幕降临后，交通员贺景环通知我马上出发，我随他们在天亮前，赶到安新县白洋淀边的大马庄，见到了地委书记吴立人、组织部长魏震、宣传部长郭春元，我向他们作了汇报，这才完成了上级领导交给的艰巨任务！

在反“扫荡”中，冀中地区军民英勇奋战，对敌作战272次，共毙伤日伪军1.1万余人，打击了日寇的嚣张气焰，使日伪军聚歼冀中区八路军和完全控制冀中地区的企图未能得逞。但我军亦遭到严重损失，部队减员一万六千八百余人，主力部队被迫转移到山区，地方武装和群众始终坚持平原游击战争，1943年才逐步恢复了原来的根据地。

（作者：原农业部部长）

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时使薄敛，所以劝百姓也。日省月试，既稟称事，所以劝百工也。送往迎来，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远人也。继绝世，举废国，治乱持危，朝聘以时，厚往而薄来，所以怀诸侯也。

——《中庸》

“三化”统筹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

——关于重庆市“三化”统筹发展的调研

万宝瑞

⁴白秀峰在高阳县庞家佐一人脱离敌人包围后，与作者失去联系。

统筹工业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发展，是全面实现小康和社会重要途径，也是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途径，各地都在积极探索，取得了不少经验。就此问题，前不久我们到重庆市进行了调研。重庆市在“三化”统筹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工作中，重点抓了实现四个转移、扭转四个倾向，其做法很值得总结。

一、“三化”统筹发展要实现四个转移

“三化”统筹发展是一个长期的任务，是一个系统工程，重庆市将“两翼”贫困地区农民增收致富作为“三化”统筹发展的突破口，实施“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即从2010年到2012年，用三年时间，使“两翼”地区有劳动能力的农户95%以上增收1万元，为此，重庆市委提出了工作重心要实现四个转移，这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社会意义。

一是制定优惠政策由面向全社会向中低收入群体转移，逐步推进共同富裕。重庆市在制定政策时强调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市委提出的十件民生大事着重惠及中低收入群众并正在落实。比如，规划建设4000万平方米公租房，解决70万户中低收入阶层住房困难，2011年已解决中低收入群众住房50万户；医疗资源向基层倾斜，40个县区1169个基层医疗机构实行基本药物“零利润”销售，药品价格平均降低30%，为群众节约药费3.65亿元，让老百姓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另外，市委三届九次全会通过了《关于缩小三个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决定》，明确了十二条措施，绝大部分都是关注基层和中低收入群众，投入资金超过1万亿元。

二是工作重心由城市向广大农村转移，加快城乡协调发展。重庆作为年轻的直辖市，加快城市发展是题中应有之意，在城市发展壮大的同时更加重视农村发展。重庆市结合大城市带大农村的特殊市情，将发展相对滞后的“两翼”地区作为重点，把“两翼”农户万元增收作为区县“一把手”工程，采取专项督查、工作点评、定期排位、专项考核等办法促进落实。并明确各级各部门的职责任务，建立了市级有关部门、集团帮扶和区县对口支援制度。据基层同志反映，以前“三农”工作雷声大雨点小，主要领导的主要精力放在抓工业经济、城市建设和财政收入，而现在工作重点完全变了，区县委书记、区县长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隔三岔五就要听取情况汇报、研究工作和检查落实。从而使农民致富愿望更强烈、发展产业更积极、增收效果更喜人了。

三是建设内容由注重经济建设向注重社会发展转移，实现经济社会同步发展。加快经济发展能够创造和聚集更多社会财富，让老百姓的腰包“鼓起来”。让老百姓活得更有尊严，腰杆更“硬起来”，这是检验执政能力的重要标尺。近年来，重庆市坚持民生支出占全市一般预算支出50%以上、对区县要求75%以

上、市级以上公共服务预算增量的 70% 以上要投向农村。比如，提前实现农村养老保险全覆盖，使 300 万老人老有所养；30 万农村留守儿童纳入“两免一补”范围，解决务工农民后顾之忧；60 万寄宿生进行生活补助、43 万贫困女童“零学费”入学；建立农村寄宿制学校 2080 所；38 个县区 5196 所学校实行“蛋奶”工程；30 个县区为非寄宿贫困生实施了“爱心午餐”。这些举措深入民心、深得民心。

四是农村工作由侧重面上号召向深入到户到人转移，使农民真正得到实惠。重庆在推动农村发展方面，一是明确了财政、项目、金融三大投入主体，保障了农业农村发展的资金需求；二是实行林下经济补贴、良种繁育体系建设补助、龙头企业税收返还和贴息补助、农业保险补助等四项直接扶持政策，帮助农户降低风险和致富增收；三是从市农科院、畜科院等单位选聘 100 多名高级专家定向服务“两翼”地区农户，派遣科技特派员 700 余名指导发展；四是推行县级专家包片、乡镇农技员包产，实行责任、绩效、考核“三挂钩”的帮扶制度，将农村工作做得更实、更细。

二、“三化”统筹发展要扭转四种倾向

从整体来看，地方经济发展注重工业化和城镇化，注重经济指标，注重大量资金投入，对“三化”如何统筹协调发展考虑不多，甚至“三化”发展各行一套。重庆市在“三化”统筹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工作中做出了新探索，扭转了影响“三化”统筹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以下四种倾向：

一是注重工业化和城镇化，忽视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和转移。据统计，1990~2000 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年均扩张 5.7%，城镇人口年均增长 4.3%；2000~2008 年，城镇建成区面积年均扩张上升到 6.2%，城镇人口年均增长却下降到 3.5%，工业化和城镇化对农村劳动力的吸纳和转移能力严重不足。重庆市对此采取三项重大举措：一是建设公租房。重庆市在未来三年内每年建设 1300 万平方米、共 4000 万平方米公租房。并将公租房、廉租房、经济适用房等保障性住房与商品房有机结合，让中低收入群体的住房拥有与商品房住户同样的环境，减少贫富差异感，这项工作重庆已走在全国前面。二是调控房价。高房价不仅造成通货膨胀，还导致老百姓对其他商品的购买力不足，严重阻碍了农村劳动力进城，拖住了城市化进程的后腿。重庆市在调控房地产价格方面把握了两个指标：城镇双职工家庭平均 6~7 年收入能买一套 60~70 平方米的普通商品房；新建住房价格增速要低于主城区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使房价少增或不增，保持长期稳定。此外，公租房以市场租赁价 60% 的优惠租金供本市就业无房人员和困难家庭租住，并可在居住五年后按成本价购买。重庆市房价在全国是比较低的。三是推进户籍制度改革。从 2010 年 8 月开始户籍

制度改革在重庆全市正式施行，并制定了两年 300 万、十年 1000 万的农民进城计划。户籍制度改革，简而言之，就是按照自愿的原则，农村居民可脱下农村的“三件衣服”，即退出宅基地、承包地和林权地，穿上城市的“五件衣服”，即享受养老、医疗、事业、工伤和生育等五大保险。重庆市户籍改革在全国是力度比较大的，也是比较成功的。

二是普遍注重平均数，忽视平均数掩盖下的不均衡。许多地方计算农民纯收入往往使用平均数，如农民纯收入全县平均水平、全镇平均水平和全村平均水平等，由于农民收入基数差异很大，往往是平均数下掩盖了不平衡，使得平均数下部分农户“被增收”。重庆市“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最鲜明的特点就是强调“户户”增收万元而非“平均”增收万元。2010 年“两翼”农民人均纯收入 4823 元，较上年增加 800 多元，同比增长 23%；户均增收 3453 元，有 30% 左右的农户一年就实现了万元增收目标。”17 个区县产业发展很快、各具特色，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就连七八十岁的老人和残疾人都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工作，使农村发展焕发出新的生机和活力。

三是片面追求 GDP，忽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融为一体，是邓小平同志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重大发展。小平同志讲：“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在实际工作中，有的地方往往一抓经济建设就忽视社会主义的本质，片面追求经济利益，忽视社会公平正义和共同富裕，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造成贫富差距拉大、剥削农民工甚至童工等现象时有发生，社会反响很强烈，如果处理不好，就会影响民族凝聚力和社会安定团结。重庆市通过“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等举措，体现了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本质：(1)使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真正融为一体。重庆市通过“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等举措，缩小城乡差距、贫富差距，发展农村经济、减少社会不公平、从中下层居民致富抓起等，使市场经济更好地体现社会主义的本质。(2)使“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成为实现“共同致富”的启动工程。“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使农村经济发展局面发生三个转变：一是由过去农产想致富“干不了”、“干不成”转变成为“我能干”、“我要干”，形成了致富的长效动力和机制；二是由过去“平均”增收转变为“户户”增收，95% 以上有劳动能力的农产三年内户户增收 1 万元，强调“户户”而非“平均”，防止平均数下的部分农户“被增收”；三是由过去重点扶持龙头企业转向重点扶持“四个到户”：项目到户、资金到户、科技到户、干部到户，保证户户增收。“两翼”万元增收工程体现了小平同志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思想，当前已进入全面落实小平战略思想的时候了。

四是一些地方抓“三农”工作雷声大雨点小，主要领导的主要精力还是抓工业、城建和CDP。重庆市通过“两翼”万元增收工程，使“三农”工作真正落到实处。“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作为市委、市政府领导“一把手”工程，市委、市政府采取专项督查、工作点评、定期排位、专项考核等办法促进落实。明确各级各部门的职责任务，建立了市级有关部门集团帮扶和区县对口支援制度；市委统战部、市工商联组织了171家民营企业助推“两翼”农户万元增收工程的实施。各区县也分别设立了由区县主要领导任组长的专职机构，实行“一把手”负责制，区委书记、区长把“三农”工作作为头等大事来抓并作为年终考核的重要内容，把这项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任务明确、责任到人。

通过“两翼”万元增收工程使党群干群关系更加紧密。我们在调研中深切感受到，重庆“两翼”农产万元增收工程，各级干部真正做到了入村到户、帮扶到人、帮助农产致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好评，广大农民一致称赞，认为是一大“德政”、一大“善举”，这项“工程”不仅使农民在经济上受益，而且增收的是老百姓的心愿、干群的鱼水情、社会的和谐稳定。据舆情监测，农民的知晓率、参与率达到97%左右。工程实施以来农村各类信访量下降了25%左右，最高的下降45%。

经过几年实践，重庆市“三化”统筹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工作效果显著，其做法很有新意，得到国内外、社会各界高度关注，创造了一些基本经验，对全国尤其是西部地区具有普遍的借鉴意义。

（此文转自《农业经济问题》2012年第1期）

（作者：原农业部副部长）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所以行之者一也。

——《中庸》

应对气候变化 科学发展森林

贺庆棠

科学发展森林，应对气候变化，有效地把握我国气候变化的基本情况，掌握未来可能的变化趋势，是行之有效的对策措施。2006年和2011年中国科学院、中央气象局联合国家有关部门先后发布了两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特别

是 2011 年正式出版发行的“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从 2008 年 12 月启动编制，有 16 个部门的 158 位专家参加报告编写，另有 13 个政府部门和 78 位专家参加了评估报告的评审工作，先后六易其稿。我有幸被聘为报告的评审专家，参与部分评审工作。现就科学发展森林，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谈点看法，供参考。

一、中国气候变暖与全球趋势基本一致，这是客观事实

研究表明⁵，1951~2009 年，中国陆地表面平均温度上升 1.38℃，变暖速率为 0.23℃/10 年。1880 年以来，中国降水无明显的趋势性变化。1951 年以来，中国的高温、低温、强降水、干旱、台风、大雾、沙尘暴等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频率和强度存在变化趋势，并有区域差异。中国大部分地区冰川面积缩小了 10%以上。多年冻土面积缩小。渤海和黄海北部海水、北方河流和湖泊结冰日数和冰的厚度均是减少趋势。近 30 年来中国近海海水温度是上升趋势，冬季升温比夏季明显。

二、气候变化的原因及其影响⁶

(一) 气候变化的原因。可分为自然因子和人为因子。自然因子主要包括火山活动、太阳变化以及气候系统内部因子变化等。人为因子主要包括人类为了改变生存条件所进行的各类活动。中国气候变化是全球与区域尺度、自然因子与人为因子共同作用的结果。

自 1750 年工业革命以来，化石燃料消费及其他人类活动导致地球大气中 CO₂、CH₄、NO₂ 以及含氯氟烃等温室气体和大气气溶胶浓度迅速增加。2008 年中国大气本底观测到 CO₂ 年均浓度已达 386.1~393.8ppm。很显然气候变暖与温室气体造成大气温室效应增强有关。同时太阳辐射的变化，气候系统内部各圈层的相互作用造成气候变化、火山喷发引起气候变化等等多种自然因素及人为改变地球下垫面等多种人为因素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IPCC 指出，人类活动很可能 90%以上是造成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虽然 20 世纪以来全球变暖和在中国变暖具有明显科学基础，是客观事实，但仍存在不确定性，主要是 20 世纪前 50 年中国观测资料缺失，后 50 年中中国城市化影响尚未剔除，因此，今后尚需做更深入研究和分析。

(二) 气候变化的影响。首先是对中国农业的影响。可以说是利弊共存，以弊为主。气候变暖使东北水稻种植面积扩展，冬小麦种植北界少量北移西扩，气候变化导致病虫害增加、范围扩大，经济损失加重，气候变化是造成化肥、

⁵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 科学出版社, 2011 年 11 月, 第一部分中国的气候变化 P3-190

⁶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 第一部分中国的气候变化原因 P23-190 和第二部分中国气候变化的影响与适应 P195-339

农药等投入量增加。极端气候、天气事件增多，危害加重。

气候变暖对中国水资源时空分布产生一定影响。区域性旱涝增多，总体上海河、黄河、辽河等北方河流流量减少，主要江河流域降水、蒸发及径流量改变较大。

气候变化对中国生态系统及生物多样性产生明显影响。冻土变化，导致长江、黄河源区以及内陆山区生态系统退化。树种分布变化、林线上升，物候期变化，生产力和碳吸收力增加，林火及病虫害加剧。草地退化、生产力下降、湿地减少、功能下降。气候变化加重荒漠生态系统脆弱性，影响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多样性、栖息地及生态系统景观多样性，物种退化灭绝等。

气候变化影响大气环流和季风变化。1989年~2009年中国近海温度上升了平均 0.6°C ，海平面上升 5cm 。赤潮加剧、珊瑚礁和红树林生态系统退化，风暴潮灾害加剧、海岸侵蚀、咸潮入侵加剧，影响海岸湿地生态系统。

中国地域辽阔，气候多样，不同地区条件各异，气候变化对各区域影响不同，生态环境脆弱的西北地区受气候影响更加显著。

三、未来气候变化与森林⁷

中国“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利用多个气候系统模式集合平均，预估到本世纪末，中国年平均温度在低排放（B1）、中排放（A1B）和高排放（A2）情境下将比1980~1999年平均分别增加约 2.5°C 、 3.8°C 和 4.6°C ，比全球平均增幅大。中排放情况下，全国年平均降水有所增加。中国海平面将继续上升，到2030年，全海域海平面上升将达到 $80\sim 130\text{mm}$ 。21世纪末，中国大部分地区降雪日将减少，积雪稳定区面积减少10%左右。

受气候变化的影响，到21世纪末，中国森林植被类型和物种分布可能发生大范围迁移。东北森林垂直分布带有上移的趋势，若降水增加，则大兴安岭森林群落中温带针阔混交林树种比例增加，落叶针叶林面积减少，甚至可能移出中国境内。温带阔叶林面积扩大，较南的森林类型取代较北的类型；高寒草甸可能被稀树草原及常绿针叶林取代，森林总面积增加。总体而言，生长力极有可能增加。但因极端气候事件发生，如温度升高导致夏季干旱，引发火灾等。可能使森林生产力下降。

21世纪末，气候变化将使物种优势度改变。如温度上升 5°C ，降水变化不大的情景下，高山岳桦林中云杉、冷杉和落叶松优势度将增加，未来50年气候变暖， CO_2 浓度倍增情景下，黑龙江伊春的红松阔叶林中山杨、白桦、落叶松优势度将降低。

未来30年中国海平面将继续上升，沿海红树林分布，可能从福建沿海扩大

⁷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第一部分第九章全球气候系统模式评估及气候变化预估

到浙江嵊县附近，物种也会增加。

四、科学发展森林⁸

森林是陆地生态系统的主体，科学经营管理森林，进行植树造林、减少毁林是采取针对性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的主要措施，在我国推进荒山荒地造林、实施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建设三北防护林、长江流域防护林、海岸防护林、农田防护林、京津风沙源治理、建设速生丰产用材林、建设生物质能源基地、建设城市森林以及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碳汇林，加快扩大森林面积，提高森林覆盖率和生产力，加大生态脆弱区植被建设和生态功能恢复和重建等，有效地促进了森林资源的恢复和增长，增加了森林碳汇能力。1980~2005年中国造林活动累计吸收30.6亿吨CO₂，森林管理累计净吸收16.2亿吨CO₂，减少毁林排放4.3亿吨CO₂。如果以2000年作为基年计算，到2010~2030年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理等净碳吸收量为4.17~6.1亿吨CO₂/每年。近年来，我国林业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科学发展森林，应对气候变化作出了重要贡献，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赞扬。科学发展森林，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已成为国际共识，写入了历次世界气候大会决议之中，而且作为是最主要、最经济、最有效的措施在国际社会推行⁹。科学发展森林、应对气候变化，十分重要。

胡锦涛主席在亚太经合组织林业部长级会议上，再次宣布：到2020年中国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的“双增”目标，这是我国根据国情采取的自主行动，是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贡献，也是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的巨大努力。我国林业部门要以科学发展森林之举，为实现此目标，做出贡献。

（作者：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博导、原校长）

拍摄“北大荒”电视纪录片具有重大的时代意义

——接受中央新影记者励隽姍采访

郭书田

您好，郭书田老师：

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以下列举采访问题，您可删选您觉得适合回答或能有感而发的问题，希望这次采访是一次真情实感的交流。

采访问题如下：

⁸第二次气候变化国家评估报告。第二部分气候变化的影响与适应，第三部分减缓气候变化的评价 P195—463

⁹气候变化与中国林业碳汇 P24—217，气象出版社，2011

一、关注和研究北大荒那么多年，您最深的感触是什么？您最想说的的是什么？

我在农垦部门工作 20 年，直接接触“北大荒”，加上间接接触有 60 多年。1975 年邓小平复出，提出“整顿治理”，农林部农垦局派工作组到北大荒军川农场十三连蹲点半年，有直接的亲身感受，比去调查研究有更多的实感。北大荒使我感受最深的是北大荒人创造奇迹的“北大荒精神”，也就是“北大荒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是自强不息艰苦奋斗，其“基因”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来自《易经》中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创造优秀文化的灵魂。二是来自人民解放军的“特别能战斗和无畏奉献的革命精神”。北大荒人创造北大荒业绩的强大动力就是这个两种“基因”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的产物。这种文化的影响力已远远超出北大荒，超出黑龙江省，超出农垦系统，实际上已成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精神动力，是精神文明的重要支柱。我最想说的是“北大荒文化”是不朽的精神财富，会一代一代传承下去，现在是第三代，是跻身于世界先进之林、巩固党的执政地位而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

二、您理解什么是农垦事业？您觉得农垦在中国有什么意义？

农垦事业其性质属于“屯垦”或“垦殖”，也就是开荒种地，解决粮食供给问题。在中国“屯垦”有悠久的历史，始于秦汉时期。“屯垦”有两种，一种是“军屯”也称“官屯”，也就是军队开荒。一种是“民屯”，也就是“移民垦荒”。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毛泽东率先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在陕西的南泥湾，由王震率领的 359 旅开展的大生产运动，为解决军队粮食自给问题做出了重大贡献，创造了“南泥湾精神”。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农垦事业，是南泥湾精神的延续与发展。最早建立的垦区有 1954 年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它是由王震率领的二军与六军、由陶峙岳率领的国民党起义的 26 兵团与由赛福鼎率领的新疆“三区”（伊犁、塔城、阿勒泰）民族武装部队等成建制转业组建起来的，执行“三个队”（生产队、工作队、战斗队）的任务，建设边疆、保卫边疆，加强民族团结，一直持续至今。其次是王震率领的铁道兵在完成“鹰（潭）厦（门）”铁路之后于 1956 年集体转业到牡丹江建立国营农场。再次是为了抵制帝国主义对我国的经济封锁，在海南与湛江建立天然橡胶垦区，组建了华南垦殖总局，由叶剑英元帅任局长，由两个以军队为主的农建师，创造了突破北纬 17° 的禁区种植橡胶成功。以后在云南的西双版纳建立了第二个橡胶垦区。1956 年，为了加强对全国国营农场的统一领导，解决粮食供给问题，保证京、津、沪三大直辖市的粮食需求，中央决定在农业部国营农场管理总局的基础上成立了农垦部，由王震任部长，把新疆、黑龙江、广东、云南四大垦区列为中央直属垦区，在北大荒由 10 万转业官兵建立黑龙江垦区并开展大规模的开荒生产，由北大荒变为北大仓，成为重要的商品粮基地。

建立与发展农垦事业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意义为：一是建立稳定可靠的商品粮基地，确保粮食安全做出贡献。在建立农垦部时，中央提出的任务是提供 100 亿斤商品粮，2010 年仅北大荒生产粮食达 360 亿斤，2011 年可达 400 亿斤。二是以全盘机械化的优势，创造高的商品率与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对农村和农民发挥示范与带动作用，也就是农业战线上的国家队作用。三是以人民解放军转业官兵为骨干建立起来的职工队伍，在边疆地区能够充分发挥建设边疆与保卫边疆，确保国家安全的作用，也就是“屯垦戍边”的作用。四是在少数民族地区发展农垦事业，对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与稳定，发挥特殊作用。五是在实现农业现代化过程中，促进了工业化与城镇化，为缩小城乡差别创造了宝贵的经验。六是在亘古荒原开荒生产，生活条件极为艰苦，培养与造就了一支能够吃大苦耐大劳而艰苦奋斗不息的职工队伍，特别是对来自城市的知识青年受到锻炼，具有深远的重大意义。

三、您觉得北大荒开发在中国农垦史上的意义、典范作用。

开发北大荒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项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举措，把北大荒变成北大仓，在中国农垦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受到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与赞扬。产生了一大批歌颂北大荒多种形式的文艺作品，深受广大群众的喜爱。一是在三江平原（黑龙江、松花江、乌苏里江）的北大荒 4000 万亩的土地上开发建设现代化农业，在古今中外是罕见的。创造的劳动生产率，特别是粮食的规模效益，不仅在全国是领跑者和排头兵，在全世界也位居前列。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 80%，比全国高出 30 个百分点。二是在全世界三个有黑钙土的国家中（包括乌克兰、美国的密西西比河流域）北大荒以国家投资由 10 万转业官兵开发建设国营企业，建立商品粮基地，是独一无二的。既具有中国特色，又具有世界意义。三是在三江的低洼易涝地区，依靠科学技术，实行“旱改水”（即把以种植小麦等旱作物改为水稻），并实现全程的机械化，是科学技术上的一项重大成就，不仅依靠水资源丰富优势解决了易涝灾害问题，而且创造了“北大荒”大米的品牌，提高了粮食效益，大大增加了种粮职工的收入。四是在 1969 年的“珍宝岛”事件中，为了抵抗苏联用最新式的重型坦克侵犯我国的领土，北大荒农垦队伍中有海陆空各兵种的转业官兵，组成武装值班连队，用重炮使其沉入江冰融化后的水下，发挥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的作用。五是近些年来，实行“场县共建”社会主义新农村，依靠大马力机械化优势，服务与带动农村 4000 万亩土地的机械化，等于增加了一个“北大荒”，农业现代化的示范作用十分显著。六是北大荒在实施农业机械化和农业现代化过程中，带动了农产品加工业和为农业服务的工业发展，促进了工业化与城镇化。总局、分局、农场、分场形成工业、交通运输业、建筑业、

商业、服务业五种产业并举，以国营为主、集体、个体、私营、外企五种所有制共存的格局。小城镇拔地而起，城镇化率达 60%，高出全国 10 个百分点，缩小了城乡差别，为改变二元结构做出了贡献。七是北大荒对外开放也走在全国农垦前列。第一个引进美国迪尔公司的全套农业机械，装备了友谊农场五分队二队，创造了一个农业工人生产 20 万斤粮食的纪录。第一个与日本日绵株式会社用补偿贸易的办法在建三江洪河农场 30 万亩的浆土上实行改良创高产的合作。在引进来的同时“走出去”，在海外建立生产基地 100 多万亩。八是北大荒从开始就建立了生产、教育、科研三位一体的体制，自办八一农垦大学，培养高级科技人员。自办科学研究院，研究解决生产建设中的实际问题，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和农业科技贡献率，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与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走在农业战线的前列。九是由于在荒无人烟的地方开发建设，初期不得不采取企业办社会的办法，社会性政策性支出很大。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逐步实现政企分离，加强与提高了企业的管理水平，减轻了企业的负担。

四、回顾北大荒的开发、发展的历程，它有着快速发展和曲折前进的阶段。今天看来，走出困境，北大荒需要什么样的能力？

北大荒的发展历程是艰辛的，也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开始办社会主义国营农场没有经验，在全面学习苏联方针和他们的援助下，在北大荒建立 100 万亩耕地的国营友谊农场，使用他们的农业机械，从拖拉机到康拜因。其他农场也大体实行总场——分场——生产队三级管理模式。由于这种吃大锅饭的管理制度和等级工资的分配制度，抑制了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在农垦系统，多年来出现“三低一高”（单位面积产量低、商品率低、劳动生产率低，成本高）而亏损大的局面。为了解决这个重大问题，开始实行改革，根据邓子恢副总理的意见，推行“包定奖”措施，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三定一奖”（定产量、定成本、定工资总额，超产奖励）办法，在分配上实行工分制，收到一定成效。但在“文革”中受到批判而夭折。改革开放以后，在人民公社实行土地包干到户经验的影响下，按照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原则，实行“大农场套小农场”的办法，兴办职工家庭农场。垦区对农场实行利润不上交，亏损不补贴的“财务包干”办法，推行农工商一体化经营，调动了广大职工的积极性与创造性，改变了垦区与农场的面貌。实践证明，北大荒巨大变化的经验在于解放思想，深化改革，特别是从根本上改变照搬苏联办国营农场与国营工业企业管理模式，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今后仍需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

五、改革开放，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浪潮，是北大荒腾飞的一个关键节点，从国家政策法规的角度讲述：为什么家庭农场和双层经营体制改革，是一个曲折的过程，也是北大荒经济发展成功的关键。它和中国其他地区的改革有

哪些不同，因而形成了今天的特色

实践证明，深化改革的关键点在于充分调动与发挥农场与职工两个积极，实现双赢与共同发展和富裕，形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营农业。经营土地以职工家庭农场为主体，即小农场为基础，大农场则为家庭农场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全过程社会化服务。同时把国家有关对农业、农村、农民的各项优惠的政策规范落到实处。把三者统一起来，即国家政策法规、农场社会化服务、职工自主经营，形成紧密型的利益共同体，就能创造巨大的生产力。在实行家庭农场过程中，遇到的阻力是很大的，主要由于机械化程度高，又是国营经济，与农村和农民是不同的，担心损害机械化和使国营经济解体。实践证明，没有出现这种问题，相反促进了机械化的发展和国有经济的壮大。当然还有不完善的地方和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出路还在于深化改革。

六、高质量、低成本、增长复垦土地的城镇化新路其独具的北大荒特色在哪里？

在增加产量的同时，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北大荒主要依靠科学技术，加强经营管理，减少损失浪费，提高投入品的利用率。降低成本的重点在降低物质费用，包括减少化肥、农药、柴油等使用量，提高利用率。在工业化与城镇化过程中，就会产生占用耕地的问题，在对自然湿地实行严格保护而荒原已经接近枯竭的状态下，实现占补平衡是关键。不仅在数量上不减少耕地，而且还要提高耕地质量。由于多年的耕作，黑土层大幅下降，土壤中有有机质减少，同时由于大马力机械的多年使用，在土壤中形成不透水的“犁底层”，自然会影响发展后劲。多年大量使用化肥与农药，带来农业的面源污染，又会影响食品安全和生态安全，这些是北大荒面临需要解决和正在解决的重大问题，即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和转变生产方式，走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之路，并在这方面发挥带头与示范作用。

七、北大荒的未来之路您认为在哪里？北大荒的农业之路是否可以被复制？

北大荒之路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具有中国特色发展农业之路。北大荒是农业战线上的国家队，是高度机械化现代农业的大样板，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光辉典范。北大荒精神是农业部在全国农业战线倡导与推广的三种精神之一，且居首位。这是可以也应当复制的。但是，它是大型国有企业，而且由于有地多人少的优势，可以实行大规模的家庭经营，这是难以在其他人多地少的地方复制的。

北大荒作为大型国有农业企业已进入国家 500 强，在农业企业中位居第一，他们正在努力拼搏，争取进入世界 500 强。北大荒的未来要在实现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中提出的两个宏伟的奋斗目标（到 2021 年建党 100 年建成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 2049 年建国 100 年实现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中发挥带头与骨干在用。为此，第一，在农业方面要走多功能发展之路，一是经济功能，二是生态功能，三是能源功能，四是文化功能，五是安全功能，

使农业成为强势产业，在确保粮食安全、食品安全、生态安全、边境安全方面，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第二，在坚持以农业为基础并提高农业现代化水平的基础上，加大调整产业结构的力度，进一步推进工业化与城镇化，为带动农民实现“三化”同步，改变城乡二元结构，实现城乡经济社会统筹发展，缩小城乡差别，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第三，在建设资源节约型与环境友好型社会，发展低碳循环经济，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效益，实现可持续发展与建设生态文明中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第四，在进一步对外开放中，利用边境优势，开发国际资源与国际市场，实现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优势互补，共同发展，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加强海峡两岸农业合作，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第五，在进一步深化改革中，通过推行股份制或股份合作制，加强和健全治理结构，实现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使广大职工真正成为企业的主人，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八、北大荒的现代化是不是中国现代化的缩影？如果是，为什么？

一位长期从事世界农业经济研究的专家称，看什么是现代化农业，不要去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农业发达国家，只要去北大荒就会一目了然，这是情真意切的判断。由荒无人烟的北大荒变成欣欣向荣的北大仓，是一部扣人心弦、鼓舞人心的壮丽画卷，是在一片黑土地上创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大农业奇迹的交响曲。它的理论价值在于创造性地践行了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思想：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在农业方面成立“产业军”，“开荒耕地和改良土壤”。在“生产资料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生产者不占有生产资料是不能获得自由的。”北大荒的实践，在国有土地上建立职工家庭农场，实现了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的直接结合，成为“联合体中的自由人”，既是劳动者又是有产者，极大地激励了这支产业大军的积极性，创造了今天北大仓的奇迹。北大荒发展的历程和取得的成就充分说明，劳动创造世界，群众创造历史的科学真理。

（作者：原农业部政策体改法规司司长）

民族文化与自主创新

孙万鹏

中国科学院院士杨叔子指出：生物界靠基因遗传而存在，靠基因变异而发展；人类社会靠民族的文化基因传承而延续，靠文化的创新而发展。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身份证”。没有民族文化，就没有灵魂，就谈不上民族、国家的品格¹⁰。笔者赞赏杨院士的观点。

¹⁰ 见《科学在这里》，第194页，科学出版社，2011

一、中华文化是至今唯一保存下来的最古老民族文化

众所周知，世界有四大古文明：它们是尼罗河畔的古埃及文明，幼发拉底河和格里斯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恒河流域的古印度文明，黄河和长江流域的中国文明。

2009年7~8月份，笔者在埃及逗留期间，才真正弄清楚古埃及文明已经不存在了。因为，现在的埃及是阿拉伯埃及共和国，虽有古迹存在但无文化存在，在埃及的大地上已经没有5000多年前的文化和人种了。

2009年12月份，笔者在印度时，才真正明白，现在的人口已接近中国的印度并不是古印度，她在印欧民族进入印度半岛之后被消灭了。现在的印度曾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官方的语言与文字是英文。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是现在的伊拉克，他们似“卖灰面碰见吹大风”，祸福无门，唯人所召。

现在，四大古文明，只有中华民族、中华文明、中华文化得以传承。难怪英国哲学家罗素说：中国与其说是一个政治实体，还不如说是一个文明实体，是一个唯一幸存至今的文明¹¹。为什么呢？罗素没有说。笔者赞成杨叔子院士的观点，“就是因为中华民族文化本身的力量”¹²。

在一些兵书说，“狭路相逢勇者胜”。笔者认为，勇者相逢智者胜，智者相逢仁者胜，仁者无敌。那么，仁者相逢呢？恐怕是和者胜了。它就是我国民族文化所说的“和而不同”。“和”中包含着“同”，但不求“同”，也同不了。世界运动的多样性、人存在的多样性，决定了只有和而不可能全同。“和”中已有了真正的“同”。这是从孔子整体的“大学”思想出发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一切民族、国家的垮台、消亡，归根结底无不是失去了“亲民”，是失去了民众支持的结果。这个至善，就是求真、务实、完美、创新，这是人的最高境界。

2009年5~6月间，笔者在俄罗斯闻悉：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波波夫谈中国为什么会走向新的巅峰时强调，得从中国5000多年的文化中寻找原因。

日本学者伊藤肇说，在日本，实业家能够各据一方，使得战后日本的经济迅速恢复，中国经典文化影响的功劳应居首位（同上）。

被誉为日本近代经济最高指导者的涩泽荣一，在他的经验之谈中归纳为一句话是“按照《论语》的思想办企业”。1931年涩泽荣一去世后，日本给他树立的铜像，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以《论语》达到“义”，以算盘达到“利”。笔者于1984和1985年访问日本时，还去寻访过它。

¹¹ 同上，第196页

¹² 同上

应该说，突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行篇》）的对立，既是对我国民族文化的传承，又是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创新。从整体上说，义（N）-利（P）-义（N），利（P）-义（N）-利（P）的三角发展，既是对我国“三生万物”的民族文化的传承，也是对我国民族文化的创新。

当然，创新在不同的子文化中，理解不同。如在自然科学文化中，创新更多是指科学的新发现、技术的新发明；在社会科学文化中，创新被理解为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指的是精神，是民族进步的灵魂，凡此等等。而自主创新，一般而言包括原始创新、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

目前看来，在知识经济背景下，科技创新能力正在成为国家竞争力的核心。然而在我国仍是处于“短板”的状态。现任中国科学院党组副书记方新指出：“国家发明奖特等奖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一直空缺，一等奖四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等奖也连续数年空缺，90 年代共评出两项，2003 年评出一项；除袁隆平获得沃尔夫奖外，中国科学家在五大国际性权威科学奖（诺贝尔奖、鲁斯卡奖、加纳德奖、菲尔兹奖、图灵奖）中尚未实现零的突破”¹³。2012 年 2 月 14 日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谢家麟、吴良镛还都是年过九旬的老人。

二、中华文化提供的创新基础、思维、方法、原则与精神

人们通常认为，知识是文化的载体，没有知识就谈不上文化。被誉为世界十大思想家之一的[英]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561~1626）认为，“知识不是一种纯思辨，不是用于谈话的资料和在争论中反驳对方的手段，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力量”（培根：《新工具》）。这就是闻名于世的“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对不对？不全对，因为，培根指出，“真正的知识是关于原因的知识——如果不知道原因，结果也就不能产生，在思考中作为原因的东西，在行动中便构成规则”¹⁴。事实上，不知道原因，先产生结果的事，比比皆是。如，一座大厦被火烧了，这是结果，人们往往再去研究失火的原因¹⁵。

其实，培根与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论思维不同，它是西方还原论思维的鼻祖，狭义科学观奠基人。正如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马晓彤指出的那样：“客观来说，在世界范围内，狭义科学观仍占主导地位，影响巨大，然而这种影响已从近代的积极作用渐渐转化为日益明显的消极作用，表现有三：（1）对科学主要作工具性理解，而忽视深层的丰富价值含义，以至出现形形色色的异化现象，科学由造福人类的‘天使’常常变成危害众生的‘魔鬼’；（2）对还原论科学范式的崇拜，造成僵化的科学意识形态，抑制非还原论范式的科学活动，否定非还原论范式的科学成果，极大阻碍了科学事业的发展；（3）潜移默

¹³ 方新：《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完善国家创新系统》，2011

¹⁴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 9 页，北京大学哲学系编译，商务印书馆，1975

¹⁵ 孙万鹏：《第 3 种科学》，第 9-10 页，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

化地撕裂人类知识体系，影响健全心智的发展，通过把相互关联的文化体系碎片引发和加剧表面上看似无关的各种社会冲突”¹⁶。

杨叔子院士说：“有知识不一定有力量，这是由于人没有思维的话就绝对没有力量。”他列举了在上海召开的 21 世纪初先进制造技术研讨会。杨叔子在会上讲：“在我国，为什么 75% 的机电设备要进口？因为进口大有好处，一是经手的人利益很多；二是进口的设备出了问题没有什么关系，如果不是进口的，出了问题就不行。”这话引起了机械工业部会议主持人的共鸣：感叹“非不能也，是不为也”。言下之意：“知识加责任感才是力量”。中华民族文化的灵魂和根本就是责任感。“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责任感不仅是优秀传统，而且是世界潮流，任重而道远。1999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在布达佩斯召开“全世界科学家大会”，中心议题讲“一个人要有强烈责任感，对社会要有强烈的命运感，对历史要有神圣的使命感，对时代要有紧迫的发展感，对他人要有真诚的同情感，对自己的良心要有鲜明的荣辱感”。

实际上，中华民族文化将“知识加责任感”看做是我们创新的基础；老子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指演化有三气的三元模型，是一种整体思维；让冲气占有演化的核心位置，是和谐之根本¹⁷。在西方，古希腊雅典哲学家柏拉图（Platon，公元前 427～前 347 年）在他的《国家篇》中播下“冲突文化”的种子。在我国较柏拉图早二千多年的黄帝时期，播下的是“二元和谐文化”的种子。2008 年 4 月，笔者访问台湾时，正遇上台湾的全球粥会世界总会“纪念黄帝创立和谐文化 5001 年”的活动。总会会长陆炳文等设宴招待我们时说：“以粥文化‘水米融洽，柔腻如一’为代表的和谐文化，肇始于黄帝，而后延传尧、舜、汤、文、武、周、孔子……”¹⁸

那么，中华民族文化为我们提供的创新方法是什么呢？我赞成杨叔子院士的说法——“顺天致性”。“顺天”是按客观规律办事，“致性”是使所办的事能合乎本性健康地发展¹⁹。现在，创新需要按照自然界和自然序提供的信息及时修正被 20 世纪自然科学当做绝对真理使用的基本公理²⁰。孔子说的“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意为懂就是懂，不懂就是不懂，应是中华民族文化为我们提供的创新原则。《周易》中乾卦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坤卦讲，“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即是说，对己应自强不息，对人要厚德载物，应看成是中华民族文化为我们提供的创新的精神²¹。

¹⁶ 马晓彤：《中国古代有科学吗？》，“天地生人学术讲座快讯”，2009 年 5 月 24 日

¹⁷ 孙万鹏：《关于“灰熵”普遍价值（OUV）的探讨》，2011

¹⁸ 孙万鹏：《朦胧——和谐的鹊桥》，2009

¹⁹ 《科学在这里》，第 205 页，科学出版社，2011

²⁰ 吕子东等：《探讨新世纪 11 大科学难题》，第 103-104 页，研究出版社，2005

²¹ 《科学在这里》，第 206-207 页

三、必须重视中华民族文化中蕴含的非唯一性的和谐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文化历来重视对立统一；中华文化历来是不排外的；中华文化与非中华文化具有非唯一性；阴阳学说重视阴阳二元的平衡与和谐；老子的“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三元模型，重视的是三元和谐。它们都是非唯一性和谐的表现形式。

目前，非唯一论是一种现代前沿的系统哲学理论。现代自然科学告诉我们，“包括观察者在内，自然界任何系统都有物质、能量、信息三个方面，元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都是通过交换物质、能量，或者信息来实现的，它们可以表现为物质、能量、信息的流”²²。从科学本体论的角度看，物质、能量和信息三者都是一种具有普遍性的客观实在。目前，我们还发现，熵比能量更重要，是熵而不是能，指挥了自然过程演变的方向²³。科学本原具有物质与非物质（信息熵、能量）的非唯一性，具有已知物质与暗物质的非唯一性，已知能量与暗能量的非唯一性。现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说：“根据现有观测数据计算，宇宙总能量中的73%是暗能量，23%是暗物质的能量，已知物质的能量则不到4%”²⁴。

事实上，在运动着的宇宙中，非唯一性是一个普适的概念。唯一性只在“短点”中或作为人为割裂时才存在。根据“大爆炸宇宙论”，约在150亿年前的一次大爆炸产生了现在我们观察所及的这部分宇宙，从大爆炸时起，发生过各种各样对称破缺的非唯一性。从我国古代社会来说，广大中国农民祖祖辈辈的愿望，没有超越出孔子总结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论语·季氏》）这两句话。邓小平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打破了经济水平低下，从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平等的“对称”，出现了对称破缺。今后，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不断发展，“公平优先”不断实现，贫富差距不断缩小，最后又实现贫富对称，这就是一种“对称(N)——对称破缺(P)——新的对称(N)”的三极发展的过程。

我们再来看一下，“物本与人本”的非唯一性。老子有一句话：“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表明在中华文化中蕴含着人本的元素。后来，因为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中国的闭关锁国；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中国遭受帝国主义侵略，濒临危亡；第三次工业革命时，中国经历了“文革”；中国的经济总量从1800年（嘉庆五年）占全球的33%（据杨叔子考查），到“文革”后，我国的经济进入了“低谷”，成了亚洲雁形飞形态的雁尾巴。为了“立足现实，改造现实”，为使老百姓生活过得好一些，我们进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时期，1978~1990年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9%，1998年我国的经

²² 颜泽贤等：《系统科学导论——复杂性探索》，第75页，人民出版社，2006

²³ 孙万鹏：《灰熵论》第二版，2012

²⁴ 白春礼：《物质科学变革性突破》，2011

济总量回升到占全球的 3.4%。但是，在以后的若干年内，我国出现了物本主义的倾向，一些地方出现了以 GDP 为追求的唯一目标。于是，2003 年党中央又明确了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反映了“人本(N)——物本(P)——人本(N)”三极发展的历史轨迹。

近年来，网络革命惊天动地，出现了计算机改变了世界的新景象。前不久有一份报告说，我国有人背数学上的圆周率 π ，用时 24 小时零 5 分钟，背了 67 890 位，打破了世界吉尼斯纪录。但与计算机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只要计算机内存位数够，即便 60 万、600 万位甚至更多，都不在话下。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也败给了深蓝机器人。有人预言：今后电脑可取代人脑。进一步现代化及全球一体化都要靠网络，网上购物，网上找对象，“网情”要取代“人情”。其实，研究表明：电脑与人脑的非唯一性存在，“网情”与“人情”的非唯一性存在，都是永远不可改变的。计算机的效率可以大得惊人，但是，一位中国工程院研究信息院士讲了一件事。他说，“你别看计算机那么高妙，但现在最好的计算机智力还不如五六岁小孩的灵性，一个五六岁的小孩在六七百人的报告厅中可以很快找到妈妈，而计算机就没有办法找到”。深蓝机器人第一次走赢了国际象棋大师，第二次大师走了最蹩脚的一步，却让深蓝机器人宣布失败。因为它，查无此程序。它不是人，没有天赋的灵性，不能自主创新，只能按一切已给定的程序办事。我们可以在网上找对象，网上谈恋爱，网上结婚，但是绝对不能在网生孩子。虚拟世界不能替代实际世界。它们也只能是非唯一性的存在，我们只能使他们更和谐。

(作者：浙江省农业厅原厅长、国内外灰学理论创始人、世界灰学文化联合会主席)

增加水利建设投入的意见

雷锡禄

编者按：

2 月 7 日，雷锡禄同志收集了大量有关我国水利建设投资的统计数据，写出了《认真学习坚决贯彻中央 2011 年 1 号文件精神，进一步增加水利投入》的原文，并附了三张历史统计表。现摘要刊载如下：

一、投入对水利建设关系重大

新中国成立 60 年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央对水利建设的资金投入，是比较重视的。1953 年到 2010 年的 58 年，全国水利建设（行业）共投入 15147 亿元，其中 1953 年~2002 年的 50 年国家水利（行业）基建投资 4404 亿元；

2003年~2010年的8年，全国水利行业按城镇管理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0743亿元。同时，农村集体和农民个人投入大量劳力和财力。为保障国民经济和广大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都起了很大作用。

1、建成水库87873座，总库容7162亿立方米。其中大型水库552座，总库容5594亿立方米；中型水库3269座，总库容930亿立方米；小型水库84052座，总库容638亿立方米。

2、建成30万亩以上灌区5295处，总有效灌溉面积4.4亿亩。

3、建成机电井458.2万眼，机电排灌站装机容量达13755万千瓦。

4、全国有效灌溉面积达到90552万亩，占耕地面积的49.6%，节水灌溉面积40971万亩。旱涝保收面积64307万亩，为耕地面积的35.2%。

5、全国除涝面积47538万亩。

6、全国水土流失治理面积106.8万平方公里。

7、全国共建成堤防29.4万公里，保护江河湖泊周边和沿海耕地70247万亩。保护居民近6亿人。

8、2010年底建成乡村水电站44815座，装机容量5924万千瓦。

二、“十二五”和“十三五”期间要更加重视水利建设

1、**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趋势。**我国要建设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注重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趋势，为此要大力开展水土保持工作，大力发展林业，坚持保护紧缺的水资源不受污染。大江大河的广大下游地区及洞庭湖等大湖周边地区，人口多，耕地少，汇集了许多大企业，是我国经济最发展的地区，保证这些地区不被洪水淹没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

2、**水利建设存在投入不足的问题。**1953年~2010年全国水利建设投入15147亿元，主要是国家投入，其中1953年~2002年，国家水利建设投资（按行业）完成4404亿元，占同期全国国家基本建设总额的3.4%，这段时期国家水利基本建设完成投资额绝对数是上升的，但水利建设投资占全国基本建设投资总数的比重是下降的，由1953年到1965年的10%、“三五”下降为7%、“五五”下降为6.5%、“九五”下降为3.6%。1953年到1980年平均为6.4%，1981年到2002年下降为3.0%，2003年到2010年，全国城镇水利（行业）投资完成10743亿元，占全国城镇固定资产总额的1.1%，而且是逐年下降的，由2003年的1.6%，2004年下降为1.27%，2005年下降为1.10%，2006年到2010年五年平均为1.06%，其中2010年为1.15%。

3、**由于水利建设投入不足等原因，水旱灾害严重。**1950~2009年的60年，全国水旱灾害受灾面积累计87.2亿亩次，平均每年14534万亩，成灾面积平均每年9562万亩，成灾率65.8%。其中1979~2009的31年，水灾平均每年受灾

面积 18592 万亩，成灾面积平均每年 13100 万亩，成灾率 70.5%，分别比 1950~1978 年的 29 年，平均每年受灾面积 10196 万亩、成灾面积 5786 万亩、成灾率 56.7%，增加 82.4%、126.4%和 13.7%。洪灾受灾人口从 1994~2009 年 16 年共 26.6 亿人次，平均每年 16621 万人；死亡人数 10.06 万人，平均每年死亡 3244 人；洪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1990~2009 年 20 年共达 22247 亿元，平均每年 1112.4 亿元。

全国旱灾，1979~2009 年共 30 年，全国平均每年受旱面积 37263 万亩，成灾面积 18900 万亩，成灾率 50.7%，分别比 1950~1978 年共 29 年，平均每年受灾面积 26960 万亩，增加了，38.2%；成灾面积 9302 万亩，增加 123.2%；成灾率 34.5%，增加 16.2 个百分点。

2010 年，全国因洪涝滑坡和泥石流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3505 亿元，比上年增加 4.4 倍，死亡 3101 人，全国因旱灾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757 亿元。

4、目前，我国综合防洪体系不健全。2010 年全国 437 条河道发生超警戒的洪水，受灾人口 2.1 亿人。水资源调控能力不足，正常年份全国缺水量 500 亿立方米左右，有 2/3 的城市缺水，近一半耕地靠天吃饭，缺少基本灌排条件。全国旱涝保收基本农田仅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35%，人均不足半亩。目前全国大型灌溉骨干工程坏损率近 40%，中小型灌区干渠完好率只有一半左右。有的地区，水土流失较为严重。为此，现有的水利工程，同我国农业要持续稳定增产和我国经济长期平稳较快发展及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要求不适应。必须逐步加强水利建设，增加水利投入。

三、加大水利建设投入

1、2011 年中央 1 号文件提出：“多渠道筹集资金，力争今后 10 年全社会水利年平均投入比 2010 年高出一倍。”为此，有些农村和水利部门同志发表文章称：“2010 年我国水利投资是 2000 亿元²⁵，高出一倍是 4000 亿元，未来 10 年总投资将达到 4 万亿元。”我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因为“全社会投入”既包括城镇有关方面的投入，又包括农村非农户和农户的投入。所指的 2010 年 2000 亿元的投入是指水利部门的投入，不是水利行业的投入，更没有包括农村投入。一号文件指出：“广泛吸收社会资金投入水利，鼓动农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按照多筹多补、多干多补的原则，加大一事一议奖补力度，充分调动农民兴修农田水利的积极性。决定将土地出让金的 10%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等。

2、据统计资料，2010 年水利行业城镇部门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2774 亿元，

²⁵ 2010 年水利投资 2000 亿元，是水利部统计部门 2011 年初的初步统计数，最后的统计数是 2319.9 亿元。

农村水利固定资产投资完成 583 亿元，其中非农户投入 566 亿元，农户投入 17 亿元。这样 2010 年全社会水利固定资产投资共完成 3357 亿元。2011 年到 2020 年共十年全社会水利投资将为 67140 亿元（2010 年价格）。2011 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为 301933 亿元，其中水利管理业（不含农户）为 3412 亿元，占全国固定资产投资 1.13%，比 2010 年的 1.2% 下降 0.7 个百分点。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执行有一年，水利投入增加幅度不理想，要完成中央 2011 年一号文件对水利投入的要求，今后几年水利投入增加幅度更大，任务更艰巨。

3、建议根据 2011 年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和其他好的经验，制定《水利投资法》，明确有关部门应筹集的水利建设资金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各级政府在水利建设投资方面的职责，明确国家财政资金用于水利建设的数量比例、增长幅度，明确不断提高水利建设效益等。

（作者：中国国际投资咨询公司研究员）

凡事，豫则立，不豫则废。言前定，则不 。事前定，则不困。行前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

——《中庸》

25 年农机化发展战略的历史渊源

张蓝水

过分相信社会主义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为了实现毛泽东提出的 1980 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1966~1978 年间，中央出面召开了 3 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倾全国之力，奋力拼搏，但最终放弃。回顾与思考 1966~1980 年这段历史，对于我国农业机械化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借鉴意义。

一、事情缘起于 1955 年毛泽东的报告

1. 时间节点来源

“1980 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应该说肇端于 1955 年 7 月 31 日，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对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们说：“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基本上完成农业方面的技术改革，大概需要 4 个至 5 个五年计划，即 20 年至 25 年的时间。全党必须为了这个伟大任务的实现而奋斗”。既是

“估计”又是“大概”，但1955年还是成为中国农业机械化步骤中的重要年份。最终正式促成此事，还是1966年2月19日毛泽东重提10年前讲话之事，说“用25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已经过去10年了”。1956年就成为“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时间起始点。1980年9月18日，项南说：“作为我们党有计划地领导农业机械化的时间，应当从1956年算起。”可为佐证。可这件事情真正确立并认真做起的时间应该说还是1966年。

2. 指导思想来源

从指导思想来说，应该更早，起始于修改、定名《矛盾论》的1952年。在统一了党中央领导人的思想之后，毛泽东形成了农业先合作化后机械化的思想。1952年，他在定名《矛盾论》的著作中加入一段完整体现其思想的论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用农业集体化和农业机械化的方法去解决”。1955.7.31报告明确提出：“在农业方面，在我国的条件下，则必须先有合作化，然后才能使用大机器。”1962年中共八届十中全会提出：“在完成反封建的土地改革以后，我们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是：第一步实现农业集体化，第二步在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实现农业的机械化和电气化。”在采用运动方式、在没有农业机器的条件下完成全国农业合作化之后，需要赶紧补上“机械化”这一课。于是，抓紧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战略部署。

二、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时期

1. 1966年2月毛泽东重提25年的目标

1959年4月29日，毛泽东提出“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要有10年时间。4年以内小解决，7年以内中解决，10年以内大解决。”“三步走”的规划很有些“大跃进”的味道。至1966年，7年多时间过去了，“中解决”收效不明显。此时，毛泽东发现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的报告，遂于1966年2月19日给王任重（时任湖北省委第一书记）写信：“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各省、市、区应当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做出一个5年、7年、10年的计划，从少数试点，逐步扩大，用25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目前是抓紧从今年起的15年。已经过去10年了，这10年我们抓得不好。”这里重提“用25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并对前10年工作做了总结，实际上是批评了从1955年谈起的全国农业机械化工作，提出了抓紧从1966年起的15年的目标，即是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简称“1980目标”）。

当时在北京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看到毛泽东的批评，2月23日表态：先将湖北文件、毛泽东批语等印发政治局、书记处，七个部委和华北局，“几天以后，中央召集一次会议讨论这个问题”。为此，他给周恩来、邓小平写信说：“我赞成将湖北省委这个文件发给各省、市、区党委研究，主席批语也一并转

发。此外，中央还可加一个批语。” 3月11日刘少奇给毛泽东写信：“要小计委就这个问题有关各方面的情况先摸一摸，提出一个方案，中央再来讨论，并要提交下次中央工作会议上加以讨论，才能使各地方的努力比较地更加符合实际。”看来，刘少奇只是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或召集一次中央专门会议讨论农业机械化问题，没有要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的设想。

2. 毛泽东提出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及规模

接到刘少奇信次日，即3月12日毛泽东复信刘少奇：“小计委派人去湖北，同湖北省委共同研究农业机械化5年、7年、10年的方案，并参观那里自力更生办机械化的试点，这个意见很好。建议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各派人去湖北共同研究。”“为了农业机械化，多产农林牧副渔等品类，要为地方争一部分机械制造权。”“又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除这三大要点外，毛泽东在信末提出“如果让各中央局各省市区党委也派人去的话，似以管农业书记一人计委一人去为宜。总共也只有大约70人左右去到那里开一个7~10天的现场会。”很明显，毛泽东是让中央出面召开一次有各省市区党委参加的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

4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对湖北省委关于逐步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设想的批示，认为毛泽东的指示“非常适时，非常重要。机不可失，我们应当立即抓紧这项工作。”并确定在湖北召开现场会议，最终促成了史无前例的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1966年初，成为中国农业机械化的一个新的重大开端。

3. “文革”发动期间的长达一个月的会议

众所周知，1966年5月4~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8月1~12日八届十一中全会是“文革”全面发动的标志。8月5日毛泽东《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让刘少奇“靠边站”了。1966年7月17日，由中央出面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开了一个月之久。先在湖北现场，后到北京结束。8月16日，周恩来与代表讲话，主调是检讨10年失误和表达决心。他说：听了毛泽东的批评，“这才开始认真抓全国农业机械化”。自此，对农业机械化事物，党中央一把手直接抓，从中央到地方大动员，的确是农业机械化领域做梦也想不到的自觉倍感荣耀的事情。

人们习惯说“文革”是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但是社会上许多人不知道，我们农机人自己也没有意识到，1966年初，毛泽东首先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是比“文革”要早的农业机械化运动，而且在“文革”进行中和结束后，这个运动一直在进行着。其高潮就是1978年1月中央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如果说“文革”跨了11个年头，而农机化运动则超过“文革”，跨了13个年头，才“刹车”停止下来。

4. 全国建设县农机修理制造厂工作会议

1969年8月13日，周恩来接见参加全国建设县农机修理制造厂工作会议代表，传达毛泽东指示：“每县都要有农机修理制造厂。”这样具体的指示和专业的会议，在全国经济领域当时是少见的。在如火如荼的“文革”中，农业机械化运动同步前进。周恩来说：“抓农业机械化，现在到时候了，不能再耽误了。”

“1969年讲计划时，首先讲农业机械化”。他说，这3年主要搞“文革”，25年的目标只剩下11年了。可以说，作为国家最高执行官的国务院总理心急如焚。

周恩来在这次讲话中提出：“农业机械化要适应各地的需要”“我们要创造出各种类型的农业机械……不仅粮食还有棉花等经济作物。”这的确是农业机械化的重要指导原则问题。农机不仅有作物适应性，更有地域适应性差异；农机化不仅要解决粮食作物，还要解决经济作物生产机械化问题。这些问题的超前性和重要性，今天已经非常清楚地突显出来。

1970年10月5日，国务院关于北方地区农业会议向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我们要切实抓紧今后10年的工作。第四个五年，争取耕作机械化水平达到可机耕面积的50%左右，排灌机械化水平达到60%左右。”12月11日中共中央正式批准这个报告。这是提到农业机械化发展水平指标的较早记录。

三、第二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时期

1. 要大队级和拖拉机手参加全国会议

在距25年目标还剩10年时间的时候，1971年4月15日，农林部、一机部党的核心小组拟定“关于筹备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的初步意见（草稿）”，提出“制订一个1980年前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建议成立筹备会议领导小组，编《毛主席论农业机械化》书。

1971年6月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的通知》，提出“制订出1980年前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研究具体政策，制定主要措施。为此，决定由8个部委主要负责人组成会议筹备小组。通知要求有“大队”级和工人、贫下中农、拖拉机手的代表参加会议。这在中央级的全国会议的安排上，可以说是十分罕见的。农业机械化的动力和成功，归根结底在农民本身的愿望和努力。

2. 规模超千人的农机化特大型会议

第二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于1971年8月16日~9月15日在北京举行，又是一个月的会议。从中央到基层的会议代表共1052人，成为名副其实超千人的农机化特大型会议。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在闭幕式上讲话。

会议讨论和拟定了《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规划（草案）》，国务院于9月15日发布。规划提出抓紧此后的10年时间，为基本上实现我国农业机械化而奋斗，

并制定了相应的政策和措施。“今后 10 年的奋斗目标，是要在 1980 年使我国农、林、牧、副、渔的主要作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 70% 以上，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要求“大造革命舆论，大搞群众运动。”“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列入各级党委的议事日程。”在中国人的意识中，“70%”占了压倒的优势。从此，农机人就把“基本上实现”定在“70%”这个节点上。

会议同时讨论和拟定了《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纲要(1971~1980 年)(讨论稿)》共有 26 条。1~7 条是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对农业机械化的基本方针，8 条是今后 10 年的奋斗目标，9~25 条是各方面的政策措施，26 条是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国务院于 9 月 16 日发出通知，要求省级政府广泛征求意见。这次会议对“1980 目标”作了许多基础性的事情。

3. 国务院成为农机化具体执行机关

1971 年 12 月 3 日，国务院提交《关于加速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主要汇报全国会议成果并表达决心。会议决心“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保证在 1980 年完成毛主席提出的‘用 25 年时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伟大战略任务。”

报告分 8 个部分：一是农业机械化的新高潮正在兴起；二是坚持党在农业问题上的根本路线；三是走我国农业机械化自己的道路；四是今后 5 年和 10 年的奋斗目标；五是大力发展地方“五小”工业；六是有关农业机械化的几个政策问题；七是加强对农业机械的管理；八是全党要为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伟大任务而奋斗。报告说：“毛主席提出的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伟大任务，只剩下不到 10 年时间了，到了必须狠抓的时候了，再也不能耽误了，也有条件办好了。”最后表达：“我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目的一定能够达到。”可知，国务院对此事充满十足的信心和绝对的把握。从国务院“给毛主席和中共中央”报告这项工作，可以认定国务院已经成为当时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战略任务的责任人和具体执行机关。有人幽默地说，国务院是全国最大的农机化局。

四、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时期

1. 筹备期最长的被拖延的会议

为了加速实现“1980 目标”，1974 年 3 月 3 日，国务院决定召开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显然，意在坚定信念，规划最后 5 年的拼搏。为此，通知省级主管负责人及有关部门人士参加会议。6 月 26 日国务院在北京召开全国农业机械化预备会议。从 1966 年起第一、第二次会议就一直运作农业机械化工作的高层领导人、副总理余秋里到会讲话：“我们的目标是：1980 年基本上实现毛主席提出的农业机械化的伟大任务。要动员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这一任务而奋斗。”“这件事是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宣布了的，是一定要实现的，是不能动摇

的。”真切表明“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是毛泽东的“专利”。余秋里提出的“要把农业学大寨和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个任务结合起来。”自此，“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也成为动员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重要场合。

1974年7月10日，会议《关于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初步规划的说明（草案）》提出：“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伟大任务，是一定要实现的。”肯定1971年会议提出的1980年机械化的主要目标。

1974年7月28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全国农业机械化预备会议情况给中央的报告》，向中共中央提出：“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农、林、牧、副、渔的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要达到70%以上。”让人们没有想到的是，第三次大会却拖延到1978年1月才召开。这可能是1975年的整顿和197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四五”天安门事件，唐山大地震，逮捕“四人帮”等“多事之秋”，1975~1976年两次普及大寨县会议及1977年中共“十一大”等，使得这样的专题会议只好一再拖延，以至拖到1978年，只剩下3年时间了。

2. “1980目标”纳入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

1975年10月15日，副总理华国锋在国务院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全党动员，大办农业，为普及大寨县而奋斗》总结报告。关于农业机械化提出：“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地、县领导机关，必须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快这一工作的速度，从各方面做好可靠安排，采取切实措施，逐年检查进度，总结经验，保证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伟大任务。”任中共中央主席后，这段话成为华国锋的重要指示。10月12日《人民日报》发表记者述评《下定决心，5年实现——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讨论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1976年4月7日华国锋任国务院总理，1980年9月辞去总理职务。

1976年12月20日，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副总理陈永贵工作报告提出：“要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我们一定要争取时间，战胜各种困难，坚决把农业机械化搞上去。”“保证完成毛主席提出的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伟大任务。”此时，只剩下4年时间了。

1977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原则同意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向中央政治局的汇报提纲《普及大寨县工作座谈会讨论的若干问题》（11月16日），转发至各省级党委。提纲之“十一、农业机械化问题”提出：“要下最大决心，想一切办法，把农业机械化搞快一些。对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规划和措施，要认真落实。”“每省先搞一个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县，取得经验。”“大城市郊区农业机械化要先行一步。”这时，必须要开的第三次大会，正在紧锣密鼓地

筹划中。这个提纲也许是“三大”的前奏曲。

3. 中共中央确认“1980目标”为毛泽东遗志

1976年9月9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逝世，举国哀痛。10月6日，华国锋等决策，逮捕“四人帮”，举国欢腾。1976年10月7日，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1981年6月辞去主席职务。

1976年12月25日国务院向中共中央提交《关于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报告》提出：“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主要目标是：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70%左右。”“拖拉机拥有量，从40万台增加到65万台到80万台”。“今后4年要达到这些指标……保证完成，力争超过。”

“下定决心，4年实现”“我们要抓紧今后4年，以最大的努力，实现毛主席的遗愿，保证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此报告成为国务院向中共中央的保证书。指标从刚性的“70%以上”，降为弹性颇大的“70%左右”。

1977年1月19日（中发2号文件）中共中央同意国务院的报告，发至省级党委、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党委、各军兵种党委。中共中央明确指出：“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遗志，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要认真贯彻执行华主席的指示”，即1975.10.15华国锋对国务院各有关部门和各省、地、县领导机关提出的要求“保证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一伟大任务”。中共中央把此事升至“毛泽东遗志”，要求“保证实现”，达到顶峰。为1年后“三大”的“决战3年”誓师提供了政治武器。

4. 史无前例进入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

1977年8月12日中共中央主席华国锋向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作的政治报告，8月18日由大会一致通过。报告最后，提出一个时期的8条任务，其中第四条是“一定要抓革命促生产，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提出“要认真贯彻执行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讲“力争上游”时，提出：“到1980年……农业要基本实现机械化”。报告对到1980年的总体任务、农林牧副渔五业和工业的任务表述均较抽象、笼统，唯独提出1980年“农业要基本实现机械化”的具体目标。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这样重要的会议上，提出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是史无前例的举动。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二任中共中央主席直接部署农业机械化，更是农业机械化领域自觉倍感荣耀的事情。

十一大政治报告讲1980年“农业要基本实现机械化”，这很可能与此前1977年1月19日中共中央批准国务院报告所指“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的遗志，是全国人民的共同心愿”有关，认为这件事已经成为全党、全国的重大原则问题。按照当时“毛主席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的思维，将“1980目标”列入十一大政治报告，成为全党意志的最高表达方式，则不难理解。其实，这件事既是一件关系全局的大事，更是一件有目标、有指标、有时限的十分具体的工作。

5. 正式开会前的组织与思想举措

1977年9月16日，经中共中央主席和国务院总理华国锋批准，以余秋里为组长的国务院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任务是遵照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指示，组织各方面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加速全国农业机械化进程。截至当年11月，全国有25个省、市、自治区成立了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成为农业机械化的掘进机。

恰逢毛泽东诞辰84周年之际，1977年12月2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公开发表毛泽东1966年3月12日致刘少奇的《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这一方面是告慰1年前逝世的毛泽东，同时也是预告世人，对于农业机械化国家将有又一个重大举动。这就是1978年元月开始为期23天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

6. 全党动员、决战3年的誓师大会

从筹备始，历时近4年，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终于在国务院主持下，于1978年1月4日在北京召开。各省、市、自治区农业机械化领导小组，部分企业和农业机械院、校、所，以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代表共823人参加会议。会议确定：“1980年，全国农、林、牧、副、渔主要作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70%左右；大中型拖拉机拥有量，比现在增长70%”。誓师大会最终把指标从“70%以上”降为“70%左右”，定格在这里。事后分析，这肯定有一番思想上的争议和较量。

陈永贵在开幕词提出会议的宗旨是：“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大办农业，大办农业机械化，为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他指出：由于“文革”的干扰破坏，前“两次会议规定的目标都没有完全实现。”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专门讨论，“随后，中共中央发布了保证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文件。”“夺取这场决战的胜利，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关系全局的紧迫的重大战略任务。”讲话所指文件，就是中共中央（1977）中发2号。

1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夺取3年决战的胜利》社论：全党都要“用毛主席关于农业机械化的光辉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在全国掀起一个大办农业、大办农业机械化的高潮，大干3年，夺取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胜利。”“把农业机械化当做一场伟大的革命来抓”。

1978年1月26日，余秋里在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全党动员，决战3年，为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而奋斗》总结报告指出：“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

业机械化，是伟大领袖和导师毛主席向全党和全国人民发出的伟大号召”。“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要求“组织起来，把大办农业机械化群众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报告》就搞好农机产品的标准化、系列化、通用化，按照专业化协作原则改组农机工业等15个方面的政策和措施作了逐项说明。对于我们这个相对落后的农业大国，这样一个影响农业全局走向的重大问题，即使只有3年时间，仍然誓言“是完全能够做到的”。那个时代，对于即使是有意误导，也没有追究责任的制度。

1978年1月26日，李先念在闭幕词中指出：“这次会议将成为我国农业机械化事业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标志。”“这次会议制定的规划和提出的目标，是积极的，可行的。”“农业机械化要大干快上，关键在省、市、自治区党委。”“坚持群众路线的方法，把省地县社各级和各行各业的力量，动员起来，组织起来，真正以自力更生为主干出一个农业机械化来。”“我国农业机械化的群众运动一定会出现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潮”。那个时代的领导人习惯于用“党委领导+群众路线”这个指挥政治运动的方法来对待经济问题，采取忽视社会基础和经济条件的做法，来对待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并行不悖的农业机械化经济工作。

会议修订完成《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规划》指出：“1955年到1965年，我国的农业机械化事业进展不大。1966年，遵照毛主席的批示，在周总理亲自领导下，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1971年，华国锋同志主持召开了第二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规划提出“保证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要求“农机工业和支农工业有一个大改组、大发展”，“认真安排好材料、设备和资金”，“加强农业机械化的科学研究工作”，“管好、用好农业机械，充分发挥机械效能”，“加强领导，夺取3年决战的胜利”。

当时参加会议的辽宁省农机厅厅长武少文，在会议期间找到组织会议的农机部门负责人项南，提出他的疑惑和担忧。项南对这位省农机厅厅长敢于实事求是提出科学合理的正确意见很重视。他在担任农机部副部长时，力排众议，坚持要调武少文到农机部担任副部长，分管农机化工作。其实，并非在上层工作的人不明此理，只是受“两个凡是”思想约束，不敢表达而已。从这个角度说，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实质上是一次“皇帝新装”式的会议，是一个在左倾思想主导下，自我安慰的会议。

1978年2月26日，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在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要求“到1985年，农业主要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85%以上”。这是在“1980目标”基础上，按照当时“农业生产新跃进形势正在到来”的判断，在农业机械化问题上唯意志论、大干快上的又一反映。

7. 史上最大规模的国际农机展览会

1978年10月20日，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举办的十二国农业机械展览会在北京开幕，正式展期14天。闭幕后，展品全部留购，又延长月余进行内部展览，组织各省派人轮流参观。参展国家有日本、英国、法国、西德、加拿大、意大利、瑞士、瑞典、罗马尼亚、丹麦、澳大利亚、荷兰。参展厂商320多家、展品700多件，技术座谈200多个项目。这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最大规模的国际农机展览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参观了展览，在国人面前打开了世界农业现代化的窗口。应该说，这是为“决战3年”早就做出并精心筹备的重大步骤之一。

五、第三次大会后的悄转和“1980目标”的终结

虽然第三次大会之后，农业和机械等职能部门都在急急火火地落实会议决策，抓紧进行农业机械化的具体调整部署。但是，对“皇帝新衣”人们逐渐怀疑和觉醒，逐渐被更多的人所认识，天真童心者越来越多。因此，也就不由自主地悄悄转动着方向盘。

1. 李先念在重要农业讲话中不提“1980目标”

1978年7月22日，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代表中央在全国农田基本建设会议发表重要讲话。8月16日《人民日报》全文刊载。讲话并不限于、甚至主要文字不在农田基本建设方面，实际是中央对当时农业问题的全面部署。第三部分专题讲“有关农业机械化和科学种田的问题”，是所讲5个问题中篇幅最长的。讲话提出：“为了加快农业机械化的进程，当前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各省、直辖市、自治区建立支农工业体系，坚决按照专业协作的原则，抓紧对农机工业进行改组”。这么重要的一位中央领导人，在这么长篇的农业讲话中，对“农业学大寨”和“1980目标”这两件农业大事，讲话却只强调了前者。而对元月国务院举行的、他亲致闭幕词的“第三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并无一字提及，特别是未提及中共中央作为毛泽东遗志、要决战3年的“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部署和任务。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很不寻常的。这无异于从背后暗示社会各界：中央或许已经停止1980年农业机械化的战略目标。

这里有一份旁证材料。会议后的1978年7月13日，新华通讯社内参（第1095号）刊发记者杨惠民文章“我国农业机械化程度的计算方法需要改进”。该文据参加第三次全国农机化会议工作的农机化学者姚监复反映所写。文章说1980年我国农业机械化程度可能达不到70%。事后，杨向姚说：这份材料发出后，上面有指示，不要采用“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提法了。

可以想象，此后的7月22日，李先念在重要的农业讲话中不提“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目标，不能不说与新华社这份内参有关。这篇讲话是不是中共中央、国务院向社会公开表达、传递放弃“1980目标”的信息？笔者有理由认定：这应该是当时中央放弃“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正式表

态。从已公诸于世的文献作为判断历史依据的角度来说，1978年7月22日是中共中央正式放弃“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目标的真正开端。因此，1978年7月22日是对毛泽东这项决策，实施23年的终结。今天看，这是中国农业机械化历史上一个重要日子，是一个新时代的开始。

2.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农业文件没有“1980目标”

1978年12月22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果断放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指导总方针。在农业方面，原则通过《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提出：“国家各部门都要大力支援农业机械化。”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在“发展农业生产力的25项政策和措施”中提出：“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到1985年，使农业主要作业的机械化程度达到80%左右。”

“为了有利于推动农业机械化这项伟大而又艰巨的事业，统一管理农业机械的设计、制造、供应、维修和有关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决定恢复农业机械部。”1985年80%左右的提法，较10个月前《政府工作报告》的85%降低了些，但仍然有“1980年目标”的影子，是大干就能快上、认定20世纪末要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产物。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和这两个涉农重要文件都一概没有提及作为毛泽东遗志、要决战3年的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战略部署。这当然与7月22日有关。时间又过了5个月，对“两个凡是”的否定，拨乱反正使人们的思想大为解放，“以阶级斗争为纲”为代表的一系列错误决策、提法和口号被放弃。在加快农业决定中，不再提及“1980目标”，就是很自然的了。但是，绝非有人所说，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放弃“1980目标”，更不是1980年7月农机部长对一份技术杂志的答记者问。

3. 1979年中央领导人正面明示放弃“1980目标”

1979年4月5日李先念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我们一定要使自动化、机械化、半机械化的生产以至各式各样的手工劳动都得到发展，充分调动我国的人力资源，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工业的发展要这样办，农业的发展更要这样办。”未再触及“1980目标”。

1979年4月20日，第一次全国农机化会议时的东道主，已任国务院副总理的王任重，到已于4月16日开幕的农业机械部全国农机局长会议讲话：“机械化怎么理解法，怎么算农业机械化，我们曾经提过一个口号，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当然现在不提这个口号了，这也是受了一点苏联的影响。我们过去有个概念，机耕面积达到70%或80%以上，就算机械化了”。“但是，不能以拖拉机有了多少，机耕面积有了多少，就算机械化了。”“必须根据整个农业发展的需要考虑怎么搞机械化。”

众所周知，1974年6月26日副总理余秋里在国务院的全国农业机械化预备会议讲过：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件事是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宣布了的”。其来源就是1966年2月19日毛泽东给王任重的信。“我们提过”之谓，似有不确。历史事实是中共中央第一任主席提出，第二任主席继承，中共中央文件列为毛泽东的遗志，全国人民心愿。“现在不提”，是因为认识到违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空想臆断，兑现无望。

根据王任重讲话要求，1979年9月4日，农业机械部提交《关于农业机械化几个问题向国务院、中央的请示报告》，提出要搞中国式农业机械化，其中说：“原定的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任务，已不可能。同时笼统地再提1985年全国农业机械化水平达到85%，既不好办，也不确切，这类口号似不宜再提了。”显示1985之85%是在1980之70%基数上累加。这是国务院农机化职能部门解放思想，正式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停止执行“1980目标”的标志。

4. 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农业决定不再涉及“1980目标”

1979年9月28日中共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与三中全会的草案相比，把“加快农业机械化的步伐”改为“要因地制宜地发展农、林、牧、副、渔业的机械化”，撤销1985年80%的规定。提出：“实现农业现代化，要积极地有计划地开展农业机械化的工作。农业机械化必须服从生产的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要引进、制造和推广适合我国特点的先进农业机械，切实搞好配套和维修服务，充分发挥农业机械的效能。大幅度地提高劳动生产率。”“实现农业现代化，整个农业必须有一个合理的布局，逐步实行区域化、专业化生产，不断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水平。不这样做，农业就不可能实行大规模的全面的机械化，不可能大规模地全面地采取一系列的先进科学技术。”要求涉农各部“在1980年内，分别作出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全面的长期规划”，不再涉及“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问题。

六、最后一年工作上的渐变与转换

1. 国务院要求抓好小麦收获机械化

1980年1月3日，国务院批转农业机械部《关于积极发展小麦收获机械的报告》。批文说：“小麦收获机械问题急待解决，也可能解决。抓好了这件事，每年就可以多收十几亿到几十亿斤粮食”。“除小麦外，水稻、玉米的收获机械问题，也同样非常迫切。”“抓好了这三大作物的收获机械化，我国的农业机械化程度，就会大大提高一步。”这是国务院放弃1980年战略目标后，选择的农机化正确切入方向和突破口。历史证明了其正确性。

2. 主要还是把农机化看得太简单了

1980年1月30日、2月1日国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听取农业机械部的工作汇

报。当汇报到 1980 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不再提了时，杨立功说：“对什么叫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过去考虑得太简单了。”薄一波说：“我看这是个主要原因，就是提出了农业机械化，但怎么就叫机械化，不知道。”“我国的农业机械化是一定要搞的，问题是要搞中国式的农业机械化。”这里，又使人想到邓子恢 1962 年 6 月 25 日提到的：“前几年没有经验，把农业机械化看得太简单了，这也‘化’，那也‘化’，搞出来用途不大，都‘化掉’了，其实不是那么简单的事”。历史是不能假设的，但却会惊人地重复。即使 1962 年在中央领导层就有主管农机化的重要领导人认识到了，但中央在指导农机化工作上仍然重复历史错误。1962 年到 1980 年长达 18 年之久。农机化全局性的错误，又回到认识的原点。

3. 农机化道路一定要走，要广义机械化

1980 年 4 月 17 日国务院批转《农业机械部关于全国农机工作会议的报告》：“实现农业现代化，包括农业机械化这个重要内容。农业机械化的问题，应当想得宽一点，不仅要想到粮食生产，还要想到装备农、林、牧、副、渔各业和社队企业，要真正从生产的需要出发，因地制宜，分别轻重缓急，讲求经济效益”。农机化纳入农业现代化，应当是广义的农机化，要讲求经济效益。

1980 年 5 月 12 日中共中央副主席邓小平说：“农业机械化的道路一定要走，剩余的劳动力要转到其他行业去。”不能在纠左中，否定农业机械化本身。

1980 年 5 月 20 日副总理赵紫阳在国务院常务会议上说：“黑龙江和吉林两省面积大、土地肥、劳动力少，机械化可以充分发挥作用，是否可以在那里（包括三江平原）搞上几千亩的商品粮生产基地，从种到收搞全盘机械化。”显示农机化因地制宜、有选择的思想。

1980 年 5 月 31 日邓小平《关于农村政策问题》同中央负责工作人员说：“关键是发展生产力，要在这方面为集体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条件。具体说来，要实现以下 4 个条件：第一，机械化水平提高了（这是说广义的机械化，不限于耕种收割的机械化），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适合当地自然条件和经济情况的、受到人们欢迎的机械化。”可见，农业机械化促进农业合作化，是巩固农业合作经济的重要条件。机械化成为农业生产的主体，农民从合作经济获益，则难以拆分。农业大规模使用机器，是改造小农经济的根本、迅速之道。

1980 年 8 月 4 日，国务院批转国家农委《关于东北商品粮基地建设座谈会纪要》指出：“东北地区面积广大，土地肥沃，又有大片荒地可以开垦，农业机械可以充分发挥作用，有发展商品粮豆生产的有利条件。”“中央决定在东北建设商品粮生产基地，这是关系到我国农业全局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一项战略性措施，也是使东北地区广大农民尽快富裕起来的一件大事。”放弃“1980 目标”后，

农机化正确选择两件大事，一是小麦收获机械化，二是东北商品粮基地生产机械化。

1980年10月20日，薄一波在农业机械部关于厅局长会议情况汇报会上说：“农业机械化如何进行，是国家的大政策”。点题一针见血。进入新时期，国家急需对农机化进行全面深入的经济学、社会学研究。

七、农业机械部对“1980目标”终结的作为

1. 部长杨立功借专业杂志宣告放弃

1979年9月22日小麦收获机械化座谈会和11月10日全国农机工作会议，农机部部长杨立功两次讲话，通篇不提“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问题。但是，11月10日讲话，对那3次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的问题作了委婉说明：“当然，限于当时的认识水平和历史条件，3次会议提出的口号、指标和某些措施以及人们对会议精神的理解和贯彻执行中都是存在一定缺点的。”在“1980目标”行动中，农机部是上传下达的业务参谋和具体执行机关，不是决策和决定机构。作为部长，有时处于一种上下之间需要揽过推功的尴尬地位。

1980年7月20日，《人民日报》转载《农业机械》杂志发表的农业机械部部长杨立功答记者问，直面“1980目标”。对现在为什么不提“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了？他说：“现在看来这个要求是不切合实际的，也是难以实现的。”“一般地说，目前已经全面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国家都是在工业化已经比较发达的基础上实现的，我国的工业基础却非常薄弱。中国由于地少人多，农艺复杂，经济文化落后，农业机械化的难度比起许多国家来说，要难得多。用25年时间（从1956年算起）实现农业机械化，本来就不大可能”。他说：“农业机械化事业是国民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要受到各方面的制约，不可能孤军前进。”“最近国务院批转我们农业机械部的一份报告中，也同意了我们的不再提这个口号的建议。”

“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是两任中共中央主席和两任国务院总理发起、决策、领导、执行的、上了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国重大战略。在13年大张旗鼓地运作中，有多少次都是国务院向中共中央报告，经过中共中央批准后执行的。要宣布停止，应该说国务院是最低机构。因为那才是国家告之国人和世界的正式表态。人民日报作为中共中央主办的媒体，本应该自己采访发布这类新闻。由国务院专业部的部长向一份技术普及杂志发表谈话，事后由人民日报转载，以此方式首次向世人公开宣布停止如此重大的国家战略决策，都是很寻常的。业内人士普遍认为，杨立功答《农业机械》杂志记者问，只是业务系统的内部通报而已。

2. 常务副部长项南1980年的作为

项南从1961~1980年工作在农机领域，曾任农机局局长，最高职务为农机部常务副部长。在这场“1980目标”运动中，常常处于砥柱中流的位置。其实，他何尝没有武少文那样的思虑，但是，他的承上启下的职务不允许他直接表白。在1978.07.22李先念讲话、1979.04.20王任重讲话之后，仅1980年内，项南在会议公开讲话，在《人民日报》等新闻媒体公开撰文，涉及评判“1980目标”和探索中国式农机化的文字就有10余次之多。尤其是他大胆地提出，农机化速度不能由哪个人主观决定，体现了实事求是、坚持真理的科学精神。

1980年1月25日，项南在《要认真总结农业机械化的经验》说：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这个口号“要求过高、过急，实际上已经行不通。”“农业机械化的发展速度，不能由哪个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它很难孤军作战，一马当先。”真理大讨论，批判“凡是”论，思想真解放，才能够、才敢于说出“不能由哪个人的主观意志来决定”这样尖锐的话。

1980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刊载的项南农村调查《丰收背后还有问题》提出：“没有机械化，腾不出劳动力搞工副业，农村不易富起来；不搞工副业，机械化的资金没有来源，节余的劳力没有出路。”讲透了农业机械化与农村多种经营的辩证关系，农民对农业机械化的真实需求和资金来源问题。

1980年9月3日，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和中国政府在北京举办“发展中国家农机工业经验交流会”，项南以《中国农业机械化的道路》发言：“我们出于迅速改变农村贫穷落后面貌的愿望和缺少实际经验，曾经相当一段时间出现过‘高速度’、‘高指标’的错误，提出过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实践证明，这个口号是不切实际的，是难以实现的。”“农业机械化必须同整个国民经济的进程相适应。”农业机械化发展的经济依据是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可以说，它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产物。农业机械化不能逾越这个经济阶段。

1980年9月18日，项南对农机企业干部培训班讲话提出：“从根本的观点看，我们的农业要过关靠什么？得靠机械化。”“作为我国农村一种新的生产力的农业机械化，它一定能使我们整个农业生产走向一个新的时代。”……“农业机械化是农业现代化的中心环节，它是不能同其他的增产措施相提并论的……由手工劳动变为机器操作，这是一场翻天覆地的变化，是一场真正的革命”。可见，农业机械化是所有农业技术中处于更高层次、更具综合性的因素。实施化肥、灌溉、生物技术，需要农业机器为之，才能形成现代农业生产力。

“我们提出过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今年是1980年。所以实现不了，就因为没有从实际出发，这个口号没有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相适应。”“根本原因是口号本身就是脱离实际的。其次是对‘四人帮’破坏国民经济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再次是思想上受了两个‘凡是’的影响，认为这个

口号是毛主席提出的，是绝对不能更改的。我想这就是为什么到了1978年全国农业机械化会议还坚持这个口号的原因”。这种心灵感触可能在1978年会议时就有了，但那时不可能有异样表示。

1980年10月10日，项南在中国农机学会“二大”以《搞农业机械化要实事求是》为题说：“边化边富，边富边化，越富越化，越化越富。恐怕这就是中国农业机械化的路子。”“农业机械化的经济效果问题。这是个长期被忽视的问题。”16个字道出了中国农业机械化发展进程的真谛，是13年拼搏实践的结晶。

1980年10月21日，项南在全国农机厅局长会议总结讲话：“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过去搞了高指标、高速度。1966年湖北农业机械化现场会，1971年第二次全国农机化会议，1975年和1976年两次农业学大寨会议，都提出了一些不切实际的要求。1978年第三次全国农机化会议达到了最高潮”。从1966年起，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左倾运动，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一直推到1978年北京最高潮，值得中国人认真思考和检讨。

1980年11月22日，《人民日报》刊载项南《中国农业机械化道路的再探讨》文章提出：“在左倾路线影响下，不是量力而行，也犯过‘高指标’、‘高速度’的错误。我们必须回过头来，实事求是地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农业机械化应当走什么道路，采取多快的发展速度，怎样才能收到最大的经济效果，仍然是一个需要再探讨的问题。”项南在他离开农机工作之前，给我们留下一个沉重的课题：让农业机械化能够收到最大的经济效果！

在他离开农机工作多年之后，1988年8月24日，对“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说了一句画龙点睛的话：“这是一个未经民主和科学论证、违背基本国情的口号”，这是鞭辟入里、深入骨髓的评判。

3. 农业机械部对30年的农机化基本总结

1980年12月农业机械部提出一份“关于我国农业机械化问题”的长篇文章，很可能就是对30年我国农机化运动的基本总结。

文章说：“农业机械化的发展必须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进程相适应”。“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口号，就是缺乏这个认识提出来的。现在看来，这个口号即使没有林彪、‘四人帮’的破坏，也是难以实现的。”“当时提出的1980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的指标……以为实现了这些指标，就基本上实现了机械化。这就把在我国条件下实现农业机械化这样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简单化了。”

“总结30年的经验教训，农业机械化存在的这些问题，有认识方面的原因，也有经验不足的问题，但根本的原因是受左倾思想的影响。长期以来，左倾思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农业机械化也没有例外”。这是农业机械部对30年特别

是 25 年农业机械化运动的盖棺定论，宣布中国农业机械化一个时代的终结。

八、1980 年后的农业机械化调整新时期

1981 年 6 月 27 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了发展生产，兴修水利，抗御自然灾害，采用农业机械和其他新技术，确有走互助合作道路的要求。随着工业化的发展，一方面对农产品的需要日益增大，一方面对农业技术改造的支援日益增强，这也是促进个体农业向合作化方向发展的一个动力。”这份重要决定是对 30 多年中国社会发展的总结。这不是中共中央对先机械化后合作化，农业机械化促进农业合作化的重新肯定和翻版吗？！深入学习、理解这段话，对当今农机化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1981 年 11 月 30 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当前的经济形势和今后建设方针》指出：“我们希望在培育和推广优良品种、改进耕作制度、搞好作物布局、有选择地推广适用的农业机械等方面，有关部门能进一步集中力量，在较短时间内做出更加显著的成绩”。由此，国家开始提倡、最终确立有选择地进行农业机械化的方针，作为新时期指导农业机械化的理论和思想。

1982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中发【1982】1 号）。纪要提出：“我国耕作制度复杂，劳力众多，集体经济力量薄弱，农业机械化必须有步骤、有选择地进行。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必须是机械化、半机械化、手工工具并举，人力、畜力、机电动力并用，工程措施和生物技术措施相结合。”从此，我国农业机械化进入中共中央 1 号文件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九、对 3 次全国农机化会议的审视与思考

1. 盲目忠诚的期限如一

“1980 年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是左倾意识影响下的产物。25 年间，特别是 1966 年以来，由于是毛泽东的“专利”，个人崇拜的历史背景，盲目忠诚的社会意识，使得不管政治、经济形势发生怎样的变换和动荡，上上下下有怎样的意见和分歧，这个年限目标始终如一。起始于第一任中共中央主席笔下，终结于第二任中共中央主席手中。

2. 节点明确的指标浮动

对于 1980 年的奋斗目标，第一次会议并未提出。1971 年 8 月第二次会议初现：“今后 10 年奋斗目标是，要在 1980 年使我国农、林、牧、副、渔的主要作业的机械化水平达到 70% 以上。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由此，即把“基本实现”的机械化水平节点定在 70%。1974 年 6 月第三次会议的预备会：1980 年的目标仍然定在 70% 以上。1976 年 12 月第二次学大寨会议将“以上”变成“左右”，即 70% 左右。1978 年 1 月第三次会议最终定在 70% 左右。这个“左右”尺度让人

难以捉摸，有些“文字游戏”色彩。

3. 矢志不移的实现决心

25年来，特别是1966年以后，先是抓紧从此年起的15年。1970年是切实抓紧今后10年。1975年是下定决心，5年实现。1976年是下定决心，4年实现。1978年是全党动员，决战3年。破釜沉舟的决战年年，不改初衷。直到1980年才在《人民日报》转载报道，向世界宣布放弃“1980目标”。

4. 自欺自慰的拼搏意志

脱离农机化必要的经济基础，农业和农民对农机的客观需求。一味强调实现领导人意志的必要性、紧迫性，国家意志和党政机关的决定性。“集中力量办大事”被推向绝对化，盲目的决心和决心的盲目交织。依靠群众运动和运动群众的方法，“皇帝新衣”的强力而为心理，直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

5. 缺乏论证的经济基础

农业机械化是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产物。在千篇一律的政治性鼓动报告中，只是强调关键是党委领导和群众运动的推进手段。没有真正实实在在论证过农业机械化与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和农村经济发展水平等条件的关系，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社会转型关系。使得农业机械化缺乏社会根基和经济基础。这使得由中央一把手提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成为无米之炊、空中楼阁。由于未经民主和科学论证、违背基本国情，一开始就带上了悲剧色彩。

（作者：原《经济日报》高级编辑）

开发生物质能 走绿色能源之路

吴信达

黑龙江省牡丹江农场管理局海林农场 2005 年建成一处大型沼气工程：有 2250 立方米高浓度卧式机械搅拌沼气池，500 立方干式贮气柜和两台分别为 75 千瓦、40 千瓦沼气发电机组。该工程每天产沼气 2000~2200 立方米，供农场场部 700 户居民炊用和发电，每天发电 2000 度供糖厂使用，沼液作肥料供农场近万亩大蒜出口基地施用。

这个工程是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的李长生研究员负责设计建成的。海林农场我较熟悉，牡丹江地区的海林农场是北大荒高寒区，有 13 万亩耕地，种植一万亩甜叶菊，生产加工天然甜叶菊糖甙，因无热量适合糖尿病患者食用而成为甜味的新宠，深受国内外客户欢迎，尤其韩国、日本每年有订单。该场饲养 3000 多头从澳大利亚引进的优良奶牛，标准化饲养的奶牛平均年产奶 7 吨。奶牛的粪便排入沼气池，产生的沼气通过管道供给场部地区使用。

2011 年 5 月 20 日至 26 日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日来我国参观访问，第一站

参观的就是海林农场、奶牛场和沼气池。他详细了解农场产业化、城镇化建设情况，还走访了农场工人家庭。

2011年李长生研究员又帮助黑龙江省甘南县利用周围丰富的玉米秸秆、设计建设一处日产3万立方米沼气的秸秆沼气厂，并提纯成生物天然气供居民和汽车使用，将有力改善当地的生态环境。

据我了解黑龙江省杜尔伯特蒙古族自治县奶牛存栏16.5万头，年产生粪便过亿吨，经过三年建设，投资1500万元的沼气发电厂已经运行，可以同时生产“气、电、肥”，每年可处理10000吨牛粪便，生产沼气75万立方米，以沼渣制成的生物肥料2000吨，发电120万千瓦，可供近8000户家庭使用一个月。目前电厂发电机已达到满功率运行，沼气容量还吃不饱，将继续扩大牛粪收储量。

秸秆打捆卖 用来赚外快

黑龙江省巴彦县是生产玉米大县，然而隆冬季节农民依然在田间地头忙碌着，他们把大量玉米秸秆打包，运往县里的生物发电厂。农民高兴地形容：秸秆当煤卖，还能赚外快，再来一个二次小丰收。松花江乡的农民李晓良开着自家的小四轮往生物发电厂送秸秆，他说：“今年种了30多亩玉米，把所有的玉米秸秆都卖了，可增收万儿八千的不成问题，这都快赶上卖粮收入的一半啦！”

巴彦县种植玉米100多万亩，以前秸秆大多用来烧柴，近几年随着农村沼气大量使用，玉米秸秆成了农民的“累赘”，烧不完、卖不掉、无处放。

2009年投资2.6亿元的国能巴彦生物发电有限公司一期工程于2011年3月正式运营。目前电厂已在巴彦县农村设置了6个秸秆收购点，过去一度影响环境和安全被当做废弃物的玉米秸秆，如今被打成捆卖给发电厂，成了农民的额外收入。

这个电厂一年可燃烧秸秆38万吨，常年收购秸秆，现在每天收购1000吨左右，秸秆收购价每吨275元，水稻壳每吨150元，来送料的还有呼兰、木兰县的农民。

这座生物发电厂每年处理秸秆等废弃物30多万吨，可生产2亿千瓦时的绿色电力，发电量接近20万吨煤的产能，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约50万立方米，大大减少了煤炭发电给环境带来的污染，实现了节能减排、低碳环保。

两点思考：

2011年底黑龙江垦区奶牛存栏42.3万头，肉牛存栏50万头，生猪存栏240万头。所排粪便是很可观的沼气资源，发展沼气潜力很大。垦区的秸秆资源保守说也有400亿斤以上，部分秸秆粉碎还田外，尚有巨大的秸秆能源资源，若将秸秆生产沼气(生物天然气)或制成“秸秆块煤”，既可减少石化资源的消耗又

可实现节能减排，这是一举多得。

目前，垦区进行新农村建设，建集中供热居民点，撤队建站要搞好规划，合理布局，分期分批推进。

（作者：农业部规划设计研究院原党委书记，曾任黑龙江省 853 农场场长、党委书记，牡丹江农场管理局局长）

在下位不获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获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获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顺乎亲，不信乎朋友矣。顺乎亲有道：反者身不诚，不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

——《中庸》

在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确权的两个问题

卢文

编者按

2月5日，卢文同志给国务院回良玉副总理、中央农村领导小组陈锡文副组长、农业部韩长赋部长、国土资源部耕地司写信，提出在土地确权等级中应注意的两个问题。刊载如下：

2月1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 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中提出：“加快推进农村地籍调查，2012年基本完成覆盖农村集体各类土地的所有权确权登记颁证，推进包括农户宅基地在内的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使用权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稳步扩大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登记试点”。这是确定农村土地所有权和涉及农民重大利益的一件大事。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

农村集体土地的所有者是谁？1955~1956年实行合作化时，农村土地归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集体所有。1962年确定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实行“四固定”，土地归生产队集体所有。上世纪八十年代，土地承包到农户经营时，是以生产队为单位按该队的土地和人口承包的，各生产队人均承包地数量不同。现在土地承包长期不变，就难以改变实际所有单位。宪法写为土地归村集体所有，

实际和事实有出入。村也有问题，当时的中央文件写道：土地归村经济合作社所有，但很多村没有成立经济合作社，没有挂牌，由村委会代行职权。村委会不是经济组织，村是自治组织，实质是行政组织，土地归村委所有等于归政权所有。是归村合作经济组织所有，还是归村委会所有？在颁证时需要明确。

要慎重严肃处理有争议的土地权属问题。在征地和拆迁中，不少地方政府违法违规行事，有的将农民围垦的围田和土地伪报为滩涂、荒山、荒地，贿赂上级批准，以低价征购或无价强占；有的收买村、组（生产队）干部，背着农民出卖土地，农民（包括承包人）全不知情；有的由市政府发文硬把集体土地说成是国有土地；有的“以租代征”，低价占有……农民发现提出抗议，就遭武力镇压，打人、抓人、囚禁，上访受打击，即使上京也无用；向法院起诉，地方法院不敢违抗当地领导旨意，或不受理，或作出袒护官方的裁决。如果确权颁证让地方政府照已占的事实去办，就等于过去的非法违规行为完全得到确认，严重损害农民利益，在群众中造成对党和政府的恶劣形象。因此，建议：（1）在确权颁证之前，对有争议的土地问题，定出解决的原则、办法，写成条例公布，照此办理；（2）对有争议的土地，不忙于确权颁证，不要简单行事，要由中央或从别处派人主持，成立专案组或仲裁组，找公正人员及当地群众选出的代表（不是当地官方指派的）参加，作实地调查，认真听取群众意见（不是只听当地官方意见），根据事实，依照法规，在不损害群众利益的情况下公正合理解决，向群众公布，然后才确定产权、颁证。

（作者：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

地 址：

北京市建国门内大街5号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
中国社会学会农村社会学委员会 邮编 100732

联系人：

陈婴婴 电子信箱：yychenai@yahoo.com

侯清香 电子信箱：houqingxiang@126.com

QQ: 1739825421